

农民，为了工农联盟，为了发展生产。

(三十一)特别在整风后。整风反右后，劳动力不是商品了。不是为人民币服务，而是为人民服务，劳动力不是商品才解决了。

(三十二)有时人们问，在我国，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法则是不是存在，是不是发生作用呢？

(第十四页)

(三十二)价值法则不起调节作用，计划、政治挂帅起调节作用。

(三十三)……在我国的制度下，价值法则不会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第十六页)

(三十三)在我们社会里，价值法则不起调节作用，即不起决定作用，对生产起决定作用的是计划，如生猪、钢铁，不用价值法则调节，是靠计划。

注 释

①本文第一、二、三、四段是对全书的批语。后面是分章分篇的逐条批语。批语前摘引斯大林原文是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三八年一月第三版译本，标明页码，以便检查对照，更好地领会毛主席的批语。

——翻印者

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社会主义部分) (第三版)的笔记

(一九六〇年)

第一部分 (从20章到23章)

一、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

教科书p.327—328頁上說：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要代替资本主义，而且要用“革命手段”。帝国主义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間的冲突“达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种“客观必然性”。这些說法都很好，是应该这样說的。这个“客观必然性”很好，很令人喜欢。說是客观必然性，就是說它不依人們的意志为轉移，不管你贊成不贊成，它总是要来的。

革命为什么不首先在西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很高，无产阶级人数很多的国家成功，而首先在东方那些资本主义水平比較低，无产阶级人数比較少的国家成功，例如俄国和中国，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无产阶级要“把一切劳动者团结在自己周围，来消灭资本主义”，(327頁)这个說法对，但是在这里还应该說到夺取政权。“无产阶级遇不到現成的社会主义經济形式”，

“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不能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成长起来”（328页）。其实不只是“不能成长起来”，而且不能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成分的合作经济和国营经济根本不能产生，当然也谈不上成长。这是我们同修正主义者的主要分歧。修正主义者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象城市的公用事业是社会主义因素，说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歪曲。

二、关于过渡时期

书中说：“过渡时期开始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完成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实现——建立起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329页）。究竟过渡时期包括什么阶段，要好好的研究。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还是既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呢？

这里引用了马克思的话：“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个转变时期中。我们的人民公社要在若干年内，实现从基本队所有制到基本社所有制的转变，而且还要进一步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人民公社实现了基本社所有制的转变还是集体所有制。

在过渡时期，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328页）这个提法原则上对。所谓一切社会关系，应该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

在过渡时期要“使生产力得到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须的发展。”在我国来说，大约至少要一、二亿吨钢吧。今年以前，我们所做的事情，主要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

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刚开始，经过五八——五九年大跃进，六〇年将是生产大发展的一年。

三、关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性和特殊性

书中说：十月革命“树立了一个榜样”，又说：“每一个国家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个提法好。在一八四八年有一个《共产党宣言》，在一百一十年以后又有一个《共产党宣言》，这就是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的《莫斯科宣言》。这个宣言就讲了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问题。

承认十月革命的榜样，承认任何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都是一样的，这就和修正主义对立起来了。

革命为什么不首先在西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很高，无产阶级人数很多的国家成功，而首先在东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比较低，无产阶级人数比较少的国家成功，例如俄国和中国？这个问题有待研究。

为什么无产阶级首先在俄国取得胜利？教科书上说：“是由于俄国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从过去的革命历史来看，革命的中心是由西方向东方转移。十八世纪末革命中心在法国，当时法国成了世界政治生活的中心。十九世纪中叶，革命中心转到了德国，无产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初叶，革命中心转到了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没有列宁主义就没有俄国革命的胜利；二十世纪中叶，世界革命的中心又转到了中国。当然以后革命的中心还会转移。

俄国革命的胜利，还因为有广大的农民群众做无产阶级

革命的同盟軍。教科书說：“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结成联盟”。（329頁）农民中有几个阶层，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依靠是貧农阶层。在革命开始时，中农总是动摇的，他們要看一看，革命有没有力量，能不能站住，革命对他有没有好处，看得比較清楚了，他才轉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十月革命是这样，我国的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也都是这样。

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从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准备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斗争，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十月革命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列宁主义是在反对一切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没有列宁主义也就没有俄国革命的胜利。

书中說：“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俄国取得胜利。革命前的俄国，有足以使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一定要在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里。书中引了列宁的話很对，一直到現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較高的只有东德和捷克，其它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都比較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較高的国家革命都没有起来。列宁曾說过“革命首先从帝国主义世界薄弱的环节突破”。十月革命时，俄国是这样的薄弱环节。十月革命后的中国也是这样的薄弱环节。俄国和中国的共同点都是有相当数量的无产阶级，都有大量被压迫的痛苦的农民，都是大国。……在这些方面來說，印度也是相同的。那么，印度为什么不能象列宁、斯大林說的那样突破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取得革命的胜利呢？因为印度

曾是属于英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这一点和中国不同。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統治下的半殖民地。印度共产党没有积极参加他們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使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权。到了印度独立后，又没有坚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

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經驗证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有一个成熟的党，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积极参加民主革命，一九〇五年提出了与资产阶级相区别的民主革命的綱領。这个綱領不只是为了要解决推翻沙皇的問題，而且要解决推翻沙皇的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同立宪民主党争取领导权的問題。中国在一九一一年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时还没有共产党。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立即积极地参加了民主革命，站在民主革命的前头。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在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一年，那时他們的革命很有生气。辛亥革命以后国民党已經墮落，到了一九二四年没有办法只好找共产党，才看到前途。无产阶级代替了资产阶级的地位。无产阶级政党代替了资产阶级政党，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我們常說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七年的时候还不成熟，从主要的意义上来說，就是指我們的党在同资产阶级联盟时没有看到资产阶级叛变革命的可能，并且也没有做应付这种叛变的准备。

教科书在这里（331第三、四段）还有这种意思：“资本主义前的经济形式占优势的国家之所以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是由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这样說是不完全的。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主要的是由于我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統治，国

内的因素是主要的。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帮助是一个重要条件。但是这个条件不能决定我们能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只能影响我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前进得快点和慢点的问题。有帮助可以快一点，没有帮助会慢一点。所谓帮助，包括他们经济上的援助，同时也包括我们对他们成功和失败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的学习。

四、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

书上说：“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通过议会和平的取得政权是有现实的可能性的。”（330页）这里说的“某些”究竟是哪些呢？欧洲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北美洲的国家，现在都武装到牙齿，他们能让你和平地取得政权吗？

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和革命力量都要准备两手，一手是和平方法取得胜利，一手是暴力取得政权，缺一不可。而且要看到，就总的趋势来说，资产阶级不愿意放弃政权，他们要挣扎，资产阶级在要命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用武力？十月革命和我国革命都曾准备了两手的。俄国一九一七年七月以前，列宁曾经想用和平的方法取得胜利。七月事件表明了把政权和平地转入无产阶级手里已不可能，就转过来进行了三个月的武装准备，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经过十月革命，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列宁还想用和平的方法，用“赎买”的方法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资产阶级勾结了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发动了反革命的武装暴动和武装干涉，在俄国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三年的武装斗争才巩固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五、关于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几个问题

331页最后一段说到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如何转变？没有讲清楚。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它附带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立即宣布土地国有令，但是完成土地问题的民主革命也还用了一段时间。

我国在解放战争中，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民主革命的基本完成，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我们还用了三年的时间来完成土地改革，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立即没收了占全国工业、运输业固定资产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转为全民所有制。

我国在解放战争中除了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号召外，还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是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性质的，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官僚资本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从日本、德国、意大利手中接收过来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重是8：2。我们解放后，全部没收了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成分消灭了。

如果以为在全国解放以后“革命在最初阶段只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只是在将来才逐渐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不对的。

六、关于暴力和无产阶级专政

333頁上对暴力这个概念使用得不够确切。馬克思、恩格斯总是讲“国家就是用来镇压敌对阶级的暴力机关”，那么总不能够說“无产阶级不仅是对剥削者使用暴力，甚至主要不是使用暴力。”

剥削阶级在要命的时候总是要动武的。而且只要他們看到革命一起来，他們就要用武力把革命扑灭。教科書說：

“历史經驗证明，剥削阶级不愿意把政权让給人民，而使用武力反对人民政权”，（333頁）这个說法不完全，不仅是在人民已經組織了革命政权以后，剥削阶级要用暴力来反对革命政权，而且当人民起来向他們夺取政权的时候，他們就要用暴力来镇压革命的人民。

我們革命的目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第一要推翻敌人，第二要镇压敌人的反抗，沒有人民革命的暴力怎么能行呢？

书中在这里还說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說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主要任务”，也說的不完全。沒有提对敌人的镇压，也沒有提到阶级的改造，地主、官僚、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要改造，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要改造，农民也要改造。我們的經驗证明，改造是不容易的，不经过反复的多次的斗争，都是不能改造好的，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残余势力和他們的影响，至少要十年、二十年的时间，甚至要半个世紀。在农村來說，基本的社有制实行了，社有变国有了，全国布满了新的城市和大工业，全国的交通運輸都現代化了，經濟情况真正全面改变了，农民的世

界观才会逐步的以至完全的改变过来。（按：书中在这里讲到“主要任务”时，引用列寧的話，与列寧的原意不符合）。

說話，写文章都力求合乎敌人、帝国主义的口味，这是欺騙群众，其結果是敌人舒服，而自己的阶级被蒙蔽了。

七、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形式問題

304頁上說：“无产阶级国家的形式可以有各种各样”这是对的。但是人民民主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同十月革命后在俄国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其实质並沒有多大区别。苏联的苏維埃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都是代表會議，只不过是名称不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中有以资产阶级名义参加的代表，有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代表，有其他民主人士的代表，他們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其中有一部分人想鬧事，但鬧不起来。这种情形好象与苏維埃不同，但是十月革命后，苏維埃的代表中有孟什維克、右派社会革命党，有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季諾維也夫派等等。他們名义上是工人、农民的代表，实质也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那时（指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接受了克伦斯基的国家机关中的大量人員，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分子。我国中央人民政府是在华北人民政府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各部門的成員都是根据地里出来的，而且大多数的骨干都是共产党员。

八、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375頁上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过程說得不对。只說了我們对民族資本的政策，沒有說我們对官僚資本的政策（沒收），对于官僚資本的財

产，我们是采取没收的办法来实现公有化的。

379頁上第二段的意思是把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改造资本主义当成一种个别的特殊的经验，否定这种经验的普遍意义。西欧各国和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高，少数的垄断资本家占统治地位，但同时也还有大量的中小资本家，据说美国的资本是集中的，又是分散的，在这些国家革命成功以后，垄断资本要没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中小资本家也一律没收吗？是不是也要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改造他们呢？

我国的东北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很高的地区，以上海和苏南为中心的江苏省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很高的地区，既然我国这些省区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那么世界上同我们这些省分类似的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实行这个政策呢？

日本人过去在东北的办法是消灭当地的大资本家，把他们的企业变成日本的国营企业或者垄断资本的企业，而对于当地的中小资本家，则用建立母子公司的办法来加以控制。

我们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的改造经过了三个步骤，即加工订货、统购统销（征购包销？），公私合营（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就每个步骤说，也是逐步进行的，这种办法使生产没有遭到什么破坏，而且在改造过程中发展了。我们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是有许多新的经验，公私合营以后，给资本家定息，就是一项新经验。

九、关于中农

我国土地改革后，土地不值钱，农民不敢“冒尖”，有

的同志曾经认为这种情况不好，其实经过阶级斗争，搞臭了地主富农，农民以穷为荣，以富为耻，这是一种好现象，这说明贫农在政治上已经压倒了富农，而树立了自己在农村中的优势。

教科书中说“中农成了农村的中心人物”这个说法不好，把中农吹成中心人物，捧到天上去，不敢得罪他们，会使过去的贫农脸上无光，其结果必然导致富裕中农掌握农村的领导权。

书中对于中农没有分析，我们把中农分成上中农、下中农，其中还有新、老之别，新的又比老的好些。历次运动经验证明：贫农、新下中农、老下中农三部分人政治态度较好，拥护人民公社的是他们，在上中农、富裕中农中，一部分人拥护人民公社，一部分人反对人民公社。河北省的材料全省共有四万多个生产队，其中百分之五十完全拥护公社，没有动摇，百分之三十五的队基本拥护，在个别问题上有意見或者动摇，有百分之十五的队或者反对，或者发生严重动摇。这些队所以发生严重动摇和反对，主要的原因是这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富裕中农手里，甚至掌握在坏分子手里。在这次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中，这些队要展开辩论，首先要改变领导，可见对中农要进行分析，农村的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对农村发展的方向关系极大。

339頁中說：“从富农那里没收来交给贫农和中农的土地”。政府没收，然后政府把土地交给农民来分，这是一种恩赐观点，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群众运动。这种观点实质上是一种右倾观点。我们的办法是依靠贫农，联合大多数中农（下中农），向地主阶级夺取土地，党起引导作用，反对包

办代替，并且有一套具体的作法，那就是訪貧問苦，物色积极分子，扎根串聯，團結核心，进行訴苦，組織階級隊伍，展开階級斗争。

书上說（340頁）：“中农按其本性來說是兩重性的。”对這問題也要作具体分析，貧农、下中农、上中农、富裕中农一方面都是劳动者，一方面又都是私有者，但是作为私有者來說，他們的私有观念是各不相同的，貧农、下中农可以說是在半私有者，他們的私有观念比較容易改变，上中农和富裕中农的私有观念就比較濃厚，历来他們对于合作化有抵触。

十、关于工农联盟

340頁三、四段上讲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但是没有叙述工农联盟怎样才能发展和巩固。讲了对小生产者农民要进行改造，但是没有讲进行改造的过程，没有讲这个过程中每个阶段中有什么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也没有叙述整个改造过程的步骤和策略。

我們的工农联盟已經經過了两个阶段，第一是建立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第二是建立在合作化的基础上。不搞合作化，农民必然要两极分化，工农联盟就无法巩固，統购統銷就无法坚持，只有在合作化的基础上統购統銷的政策才能維持，才能彻底实行。現在我們的工农联盟要进一步建立在机械化的基础上，单有合作化、公社化而无机械化，工农联盟是不能巩固的。就合作化來說，如果只是小合作化，工农联盟也是不巩固的。还必须从合作社发展到人民公社，还必须从人民公社基本队有发展到基本社有，再由社有发展到国

有，在国有化和机械化互相結合的基础上，我們就能夠把工农联盟真正的巩固起来，工农之間的差別就会逐步消失。

十一、关于知識分子的改造

341頁专讲培养工农自己的知識分子、吸收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設，但没有讲对知識分子的改造。不但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要改造，就是工农出身的知識分子也因为在各方面受資產階級的影响而需要进行改造。文艺界的刘紹棠当了作家以后，大反社会主义就是证明。在知識分子中，世界观的問題常常表现在对知識的看法上，究竟知識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有些人把知識看成自己的財產，待价而沽，沒有高價錢就不出卖，他們只专不紅，說党“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搞電影的說党不能領導電影，搞歌舞的說党不能領導歌舞，搞原子能科學的說党不能領導原子能科學事業，總之說党不能領導一切。

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过程中，对知識分子的改造是一个极大的問題。不重視這個問題，对資產階級的东西采取將就态度当然是不对的。

同頁上說到过渡时期的經濟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的矛盾，这是对的。但这段只說在經濟生活上的一切領域中开展誰战胜誰的斗争，却是不完全的，我們的說法是在三條战綫上即政治、經濟、思想的战綫上都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书上說我們吸收資產階級分子参加企业管理和国家管理（341頁也这样說），但我們提出資產階級分子进行改造的任务，帮助他們改变自己的生活習慣、世界观以及个别問題

上的观点；书上在这里却不提改造。

十二、关于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关系

书上把社会主义工业化看成是农业集体化的前提，这种说法并不合乎苏联自己的情况。苏联基本上实现集体化是在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二年，那个时候，他们的拖拉机虽然比我们多，但是在一九三二年机耕面积还不到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点三。集体化不完全决定于机械化，故工业化不是前提。

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集体化完成得很慢，重要的原因是在土地改革以后，没有趁热打铁，而是间歇了一个时期，我们的一些老根据地也出现过一部分农民满足于土地改革而不愿再向前进的现象。问题并不在于有没有工业化。

十三、关于战争与革命

(352—354页)书上说，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能够在没有国内战争和国外武装干涉的情况下建成社会主义”，又说：“这些国家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没有经过国内战争”。应当说，这些国家是通过国际战争的形式来进行国内战争的，是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合而为一的进行的，这些国家的反动派是用苏联红军的铁犁犁掉的。说这些国家没有国内战争是只从形式上看问题，没有看到实质的说法。

教科书说东欧各国在革命后“议会成了广泛代表人民利益的机构”，其实这种议会同旧的资产阶级议会完全不同，只是形式上的相同。我们解放初期的政治协商会议，名义上同国民党时期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一样的，同国民党谈判的时

候，我们对政治协商会议不感兴趣，蒋介石却很有兴趣。解放以后，我们把这个招牌接过来，召开了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起了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

教科书上说中国“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组织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页)为什么只提革命斗争、不提革命战争？从一九二七年起直到全国胜利，我们进行了二十二年延续不断的革命战争。在这以前，从一九一一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还有十五年的战争，这里面有革命战争，也有在帝国主义指使下的军阀混战。如果从一九一一年算起，一直到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可以说连续进行了四十年的战争，其中包括革命的战争和反革命的战争，我们党成立之后所参加和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有三十年。

大革命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这是一个法则。只看到战争的坏处，看不到战争的好处，这是战争问题上的片面性，片面的讲战争的毁灭性对于人民革命是不利的。

十四、落后国家的革命是否更困难？

在西方各国进行革命和建设有一个很大的困难，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毒害很厉害，已经渗透到了各个角落里去了。我国的资产阶级还只有三代，而英、法国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了几十代了。他们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有二百五、六十年至三百多年，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影响到各个方面、各个阶层，所以英国的工人阶级不跟着共产党走而要跟着工党走。

列宁说：“国家愈落后，它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更困难”。(×××页)这个说法现在看来不对。其实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越困

难，人越穷，越要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业人数比较多，工资水平比较高，劳动者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很深。在那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看来并不那么容易。这些国家机械化程度很高，革命成功后，进一步提高机械化，问题不大，重要的问题是人的改造。在东方，象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都是落后的、贫穷的，现在不仅社会制度比西方先进得多，而且就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也比他们快得多。就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历史来看，也是落后的赶上先进的，例如在十九世纪末叶，美国超过英国，后来二十世纪初德国又超过英国。

十五、大工业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吗？

教科书说：“走上社会主义的国家面临着这样一项任务：以加快发展大工业（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的办法，最迅速地消除资本主义统治的这些后果。”（349页）这里把发展大工业说成是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说得不完全。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能改造旧的生产关系。我们的革命开始于宣传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要造成新的社会舆论，以推进革命。在革命中推翻了旧的上层建筑以后，方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生产关系被消灭了，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这就为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于是就可以大搞技术革命，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还要继续进行生产关系的改造，进行思想改造。

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

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很清楚。

十六、列宁论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

（375页）引用列宁的一段话，讲得很好，可以用来辩护我们的作法。他讲到：“居民的觉悟程度和实行这种计划或那种计划的尝试等，都一定会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中反映出来。”我们的政治挂帅就是为了提高居民的觉悟，我们的大跃进就是实现这种计划或那种计划的尝试。

十七、工业化的高速度是个尖锐的问题

教科书说：“工业化的速度对于苏联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386页）现在在我国，速度问题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原来的工业越落后，速度问题越尖锐，不但国与国之间比较是这样，就是在一个国家的内部，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比较起来也是这样。例如，我国的东北和上海，因为那里的基础比较好，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投资增加相对也慢一些。而另外一些原有工业基础薄弱，而又迫切需要发展的地区，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投资增加得很快。上海解放十年一共投资二十二亿元，其中包括资本家投资五亿多元，它原有工人五十多万人，除了调出几十万工人外，现在全市有工人百万多人，只比过去增加一倍。这同一些职工大量增加的新城市比较，就可以明显地看到工业基础差的地方速度问题更尖锐。书上这段话只讲了政治环境要求高速度，没有讲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许可高速度。这是一种片面性，如果只有高速度的需要

而沒有可能，那么怎能做到高速度呢？

十八、大、中、小并举是为了高速度

381頁上虽然提到我們广泛发展中小型企业，但并没有正确的反映我們的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的思想。說我們“規定广泛地发展中小型企业，由于国内技术經濟十分落后，人口众多，以及实际的就业問題。”問題并不在于技术落后，人口众多，增加就业，在大的主导下，大量的发展中小型，在洋的主导下普遍采用土法，主要是为了高速度。

十九、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可以长期共存嗎？

教科书386頁上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設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內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就是說，不能建立在最巨大最統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散漫而落后的农民小商品經濟的基础上。”这个說法当然是正确的，由此推論下去就可以合乎邏輯地得出这样的結論：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設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內建立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个不同的所有制的基础上。

苏联的两种所有制并存的时间太长，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矛盾实际上是工农的矛盾，教科书上不承认这个矛盾。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长期并存下去，同样会越来越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充分滿足农民生活对农业生产不断增长的需要，不能充分滿足工业对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要滿足这种需要就不能不解决这两种所有制的矛盾，不能不把集体所有制变成全民所有制，不能不在全国单一的

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來統一計劃全国的工业和农业的生产与分配。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不断发展的，生产关系这个时候适合生产力，过一个时候就不适合了。我国在完成高級合作化以后，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出現了小社并大社的問題。

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規律等等，現在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但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要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总有一天要为生产力发展所突破，总有一天它們要完結自己的命运，能說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一些經濟范畴是永恆不变的嗎？能說按劳分配，集体所有制这些范畴是永久不变的，而不象其他范畴一样是历史范畴嗎？

二十、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能只靠机器

392頁上說：“机器拖拉机站是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工具。”教科书上在很多地方強調机器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作用，但是如果不提高农民的觉悟，不改造人的思想，只靠机器，怎么能行？两条道路斗争的問題，用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人和訓練人的問題在我国是个大問題。

395頁上說：实行全盘集体化的初期的任务，提到和敌对的富农分子的斗争等等，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教科书对合作化以后农村的情况的叙述，却不讲富裕阶层的問題，也不讲内部矛盾。例如国家和集体与个人之間的矛盾，积累和消費之間的矛盾等等。

402頁上說：“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涨的条件下，广大的中农群众不再动摇”，不能籠統地这样說。一部分富裕中

农现在动摇，将来还会动摇。

二十一、所謂“彻底巩固”

“彻底巩固集体农庄所有制。”（P.407）“彻底巩固”这四个字看了不舒服。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怎么能彻底呢？如果自有人类以来，所有的人都不死，都“彻底巩固”下来，这个世界怎么得了？宇宙間，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死亡，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就蚕的一生来说，不但它最后一定要死亡，而且它一生发展过程中要经过蚕子、蚕、蛹、飞蛾这四个阶段，每一阶段都要进行到后一阶段，每一阶段都不能彻底巩固的。飞蛾最后死了，旧的质变成新的质（新下来很多蚕子），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但是从蚕子到蚕，到蛹，到飞蛾的发展中显然也不只是量变，而且有质的变化——是部分的质变。人也是从生到死的这个过程中，经过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到老年这样不同的阶段。人从生到死是一个量变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地进行部分质变的过程。难道能够说，从小到大，从大到老只有量的增加，没有质的变化？人的机体里，细胞不断地分裂，不断地有旧细胞的死亡，新细胞的生长，人死了就达到整个的质变，这个质变是通过以往的不断的量变，通过量变中不断的部分的质变而完成的。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中没有质变；质变中有量变，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

在一个过长的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部分质变。如果没有部分质变，没有大量的量变，最后的质变也不能到来。例如一个工厂，厂房有

了，规模有了，里面的机器设备部分地、部分地更新，这就是部分的质变。工厂规模外形都没变，但工厂的内部变了。一个连队也一样，百多人打了一仗，伤亡了几十个人，要补充几十个人，不断地战斗，不断地补充，就是这样，经过不断地部分的质变，使这个连队不断地发展和坚强起来。

打垮蒋介石这是一个质变，这个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例如要有三年半的时间，要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蒋介石的军队和政权，而这个量变中间同样有部分质变。在解放战争期间，战争经过几个不同的阶段，每个新的阶段和旧的阶段比较都有若干性质的区别。从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是一个质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在我国是通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这样一些不同阶段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

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由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不同的公有制组成的。这种社会主义经济，有它的发生发展过程，难道就没有它进一步变化的过程吗？难道我们能让这两种所有制长远地“彻底巩固”下去么？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这些经济范畴难道是永生不灭的么？难道是只有生长发展，而没有死亡变化么？难道不象其它的历史范畴一样都是历史的范畴么？

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东西必然要死亡。共产主义时期也还是不断有发展的。共产主义可能要经过许多不同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什么都不变了么？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了，就只有量变再没有不断的部分质变么？

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另一个阶段的、不断的进行

的。但是每个阶段总是有个“边”。我們每天讀書，从四点钟开始，到七、八点钟結束，这就是“边”。拿思想改造來說，社会主义的思想改造是要长期进行的，但每一次思想改造运动，总是有个結束，就是有个“边”。在社会主义思想战线上經過不断的量变，不断地部分质变，总有一天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完全肃清了，到那时，这种思想改造的质变也就完成了，然后又會开始新的质的基础上的量变过程。

建成社会主义也有一个“边”，要有笔帐。例如：工业产品占多少比重，生产多少鋼，人民生活水平多么高等。說建成社会主义有个“边”，当然不是說不要进一步过渡到共产主义，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有可能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可以叫做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二是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即由比較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到比較发达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時間。經過了后一阶段，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大为丰富，人的共产主义觉悟大为提高，就可以进入到共产主义高級阶段了。

P.407上說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生产不断迅速地扩大，生产率不断提高，讲了許多“不断”，但只有量的变化，沒有許多部分的质变。

二十二、关于战争与和平

408頁上說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生产过剩的危机和失业人数增加”，这就是酝酿着战争。难道馬克思经济学原理忽然失灵了么？难道世界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就能彻底消灭战争嗎？

能不能說現在出現了永远消灭战争的可能性？出現了把世界一切物力财力利用来为全人类服务的可能性？这种說法沒有馬列主义，沒有阶级分析，沒有把资产阶级統治下的情况与无产阶级統治下的情况区别开来。不消灭阶级怎么能消灭战争？世界大战打不打不决定于我們。即使签定了不打仗的协定，战争的可能性也还存在。帝国主义要打仗的时候，什么协定也不算数。至于打起来用不用原子弹、氢弹，那是另外一个問題。虽然有了化学武器，但是打仗的时候沒有用，还是用常规武器的。即使在两个陣营之間不打仗也不能保证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不打仗，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可能打仗，帝国主义国家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可能打仗，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现在就在打。战争是阶级冲突的一种方法，只有經過战争才能消灭阶级，只有消灭阶级才能永远消灭战争。不进行革命战争，就不能消灭阶级。我們不相信，沒有消灭阶级，要消灭战争武器，这不可能。在人类的阶级社会历史上，任何阶级，任何国家，都是注意实力地位的。搞实力地位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军队是阶级实力的具体表现。只要有阶级对抗，就有军队，当然我們是不希望打仗的，我們是希望和平的，我們贊成用极大的努力来禁止原子战争，并且爭取两个陣营签订互不侵犯的协定，爭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們最早提出来的主张，如果能够实现这个主张，对整个社会主义陣营，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設都是很有利的。

409頁說：現在苏联已不再受资本主义的包围了，这个說法有使人睡觉的危险。当然現在的情况已經和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有很大的改变，在苏联的西方有了东欧各

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的东方有我們，朝鮮、蒙古、越南这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导弹沒有眼睛，它可以打几千公里、万把公里，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周围布满了美国的軍事基地，这些軍事基地的箭头都是朝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能够說現在已經不在导弹的包围之中了嗎？

二十三、“一致”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嗎？

417頁上說，社会主义“團結一致”、“坚如磐石”，說一致就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只承认團結一致，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内部有矛盾，不承认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規律就被否定了，辯证法就中断了，沒有矛盾就沒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因为不一致才有團結的任务，才需要为團結而斗争，如果总是十分一致那还有什么必要不断进行團結的工作呢？

二十四、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权利

414頁讲到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沒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这是最根本的权利，沒有这种权利，就沒有工作权、受教育权、休息权，等等。

社会主义民主的問題，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沒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們的影响的問題，象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誰的手里，由誰来发議論，都是属于权利的問題。如果这些东西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

少数人手里，那么全国絕大多数迫切需要大跃进的人在这些方面的权利就被剝夺了。如果电影掌握在钟饰裴这些人手里，人民又怎么能够在电影方面实现自己的权利呢？人民内部有各种派別，有党派性，一切机关，一切企业，掌握在哪一派的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問題关系极大。掌握在馬列主义者手里，絕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是右派分子手里，这些机关、这些企业就可能变质，人民对这些机关、这些企业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必須有权管理上层建筑，我們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問題了解为国家只是由部分人管理，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二十五、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是革命？

417頁說：“社会主义制度下，沒有同共产主义相冲突的階級和社会集团，所以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通过社会革命完成的。”

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是一个階級推翻另一个階級，但是不能說这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就是质的飞跃，就是革命。我国的个体經濟变为集体經濟，再从集体經濟变为全民經濟，都是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由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轉变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也不能不說是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当然按需分配是逐步实现的，可能是主要物資能充分供应了，首先对这些物資实行按需供应，然后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推行到其它产品去。

拿我国的人民公社的发展來說，在从基本队有制轉变为基本社有制的时候，在一部分人中間会不会发生抵触現象，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我们实现这个转变的一个决定性条件是社有经济的收入占全社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实现基本社有制，对于社员一般都是有利的。这样，估计对绝大多数人不会抵触，但是原来的队干部，到那个时候，他们不能象原来那样当家做主了，他们的管理权力势必相对缩小，他们对于这种改变会不会抵触呢？

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消灭了阶级，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会有某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例如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对他们很有利，在转到按需分配时，他们可能会不舒服。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要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有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触。人这个动物就是怪，他有一点优越条件就有架子，……不注意很危险。

二十六、所谓“中国没有必要采取

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形式”

419 页上的第一段说得不对。

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资产阶级，看到那个时候俄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形，断定无产阶级不能改变这种情况，无产阶级没有力量保持自己的政权，认为只要他们动手，就能使无产阶级政权垮台，于是他们实行武装的反抗，这就使得俄国的无产阶级不得不采取激烈的办法来没收他们的财产，那时候，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双方都还没有经验。

说中国的阶级斗争不尖锐，这不合实际。中国革命可尖锐呢。我们连续打了二十二年的仗，我们用战争打垮了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没收了占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百分之八十的

官僚资本，这样才使我们有可能对占百分之二十的民族资本采取和平办法来加以改造，在改造过程中，还经过了“三反”、“五反”那样激烈的斗争。

420 页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描写得不对，解放以后，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是逼出来的。我们打倒了蒋介石，没收了官僚资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进行了“三反”、“五反”，实行了合作化，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市场，这一系列的变化，一步一步地逼着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走接受改造的道路，另一方面，共同纲领规定了各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使资本家有利可图的政策，宪法又给了他们一张选票、一个饭碗的保证。这些又使他们看到接受改造就能够保持一定的地位，并且能够在经济上、文化上发挥一定的作用。

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资本家对企业没有实际上的管理权，并不是“公方代表和资本家共同管理生产”，不能说：“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受到了限制”，而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教科书上没有吸取我们所说的公私合营企业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这个意思，当然现在说来不是四分之三，而是十分之九，甚至更多了。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已基本完成，但是有机会他们还是要猖狂进攻的，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被我们打退了，一九五九年又通过他们在党内的代表向我们进行了一次进攻。我们对民族资本家的策略是拉住他们又套住他们。

书中采用了列宁的话（421页）国家资本主义是“阶级斗争另一种形式的继续”，这是对的。

二十七、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的期限

423頁上說：我們在一九五七年政治战綫、思想战綫“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我們不这样說，而是說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同頁上說，要在十年或十五年內把中国变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國家；这倒可以同意。这就是說，在第二个五年計劃以后，再經過两个五年計劃到一九七二年爭取提前二、三年到一九六九年，除了实现工业現代化、农业現代化、科学文化現代化以外，还要国防現代化。在我們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設，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早了。

二十八、再談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

423頁上說，“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以前，在所有制方面（包括农业在內）的改革已經取得胜利，是因为有强大的社会主义陣营存在，有苏联这样强大的高度发展的工业国家的援助。”这种話讲得不对，在东欧这些国家同我們一样“都有强大的社会主义陣营存在，有苏联这样的高度发展的工业国家的援助”这样两个条件，为什么不能在工业化实现以前完成所有制方面（包括农业在內）的社会主义改造呢？至于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問題，实际上，苏联也是先解决了所有制的問題，然后才实现工业化的。

从世界的历史看来，資产階級革命，資产階級建立自己的国家也不是在工业革命之后，而是在工业革命以前，也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有了国家机器，然后进行宣传取得实

力，才大大推动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关系搞好了，走上軌道了，也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之后。拿資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來說，先是简单的协作，然后发展为工場手工业，这时已經形成了資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是手工工場还不是用机器生产，这种資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創造了条件，在英国是在資产階級革命以后（十七世紀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德、法、美、日也都是經過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以后，資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

首先造成輿論夺取政权，然后才解决所有制問題，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規律。无产階級革命同資产階級革命虽然在这个問題上有所不同（在无产階級革命以前，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資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經在封建社会中初步成长起来）但基本上是一致的。

第二部分（从24章到29章）

二十九、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

433頁上只是讲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互作用”，而沒有讲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資料所有制，劳动中人与人之間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可以說是有底的，例如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整个国民經济变成了单一所有制以后，在相当长的時間內，总还是全民所有制，但同样是

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不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哪些企业由誰去管理，这仍然是重要問題。一九五八年有些基本建設单位实行了投資包干制，就大大地發揮这些单位的积极性，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积极性，必須發揮企业和地方的积极性，妨碍这种积极性就不利于生产。可見在全民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中，也还有要解决的矛盾，至于劳动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更是要不断改进的。这方面很难說有什么底，在劳动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問題上，例如，领导人采取平等态度，改变某些規章制度，“两参”、“三結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作。原始公社的公有制時間很长，但是人們在劳动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却有很多的变化。

三十、集体所有制必然要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435頁上只讲公有制的两种形式的存在是客观必然性，沒有讲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是客观必然性。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过程，現在我国有些地方就已明显地看出来，河北省成安县的一个材料：說有些經濟作物区的公社現在很富，积累提高到了百分之四十五，农民的生活水平很高。这种情况如果繼續发展下去，不让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来解决这个矛盾，农民的生活水平就会比工人高，对于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438頁上說：“国营企业和合作社之間的差別不是根本性的差別……具有两种形式的公有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同資本主义比較起来，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之間的差別不是根本性的差別。就社会主义經濟內部來說，两者之間的差別又是根本性的差別。教科書把这两种公有制的形式

說成是“神圣不可侵犯”，如果就敌对势力来讲是可以的，如果要就它本身的发展过程來說，那就錯了。任何东西都不能看作是永恆的，两种所有制的并存不能是永恆的。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自己变化的过程。

若干年以后，人民公社的社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以后，全国就成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它在一个时期內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全民所有制，在經過一定的时期才进而为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所以，全民所有制也有一个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变化过程。

三十一、关于个人财产

439頁上說：“另一部分是消費品……成为劳动者的个人财产”，这种說法使人以为社会产品中原属于消費品的部分就要分配給劳动者成为个人财产，这是不对的。消費品中一部分是个人财产，一部分是公共财产，如文化教育設備，公共医疗，体育設備，公园等等，而且这部分公共财产会越来越多，当然这部分也归每个劳动者享受，但它不是个人财产。

440頁上把劳动收入和儲蓄，住宅，家庭用品，个人消費品及其他日常設備等平列起来，不好。因为儲蓄，住宅等都是劳动人民收入轉化而来的。

这本书在不少地方只談个人消費，不讲社会消費，如公共文化、福利事业、卫生等，这是一种片面性。我們农村中的房屋还是很象样子的，要有步驟地建設，特别是城市居民房屋，主要是應該用集体的社会力量来搞，不应靠个人力量，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不搞社会集体事业，还是什么社会主义？有人說，社会主义比資本主义更注意物质刺激，这种說

法簡直是不象样子！

教科书在这里說“集体农庄生产的财产，包括个人财产包括个人副业”，对于这种个人副业不提公有化的問題，这样农民就永远只是农民。一定的社会制度在一定的時間之内需要巩固它。但这种巩固必須要有一个限度，不能永远地巩固下去，否則就会使反映这种制度的意識形态僵化起来，使人們的思想不能适应新的变化。

同一頁上說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結合的問題：“这种結合是用按着社会成員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支付劳动报酬的方法，貫徹个人物质利益原则来实现的。”这里沒有讲必要的扣留，而且把个人利益放在这种結合的第一位，就把个人物质利益原则片面化了。

接着 441 頁上說：“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矛盾不是对抗的，可以得到逐步的解决。”說得很空，不能解决問題。象我們这样的国家，人民内部矛盾如果不是一、二年整一次风，是永远得不到解决的。

三十二、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443 頁 第五段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存在，也讲要克服这种矛盾，但是并不承认矛盾是动力。

接下去的一段讲得还好，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只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某些方面和领导經濟同某些形式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所有制方面（例如两种所有制）也存在着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問題。

再下面一段的說法就很有問題，說“社会主义制度下的

矛盾不是不可調和的矛盾”，这种說法不合乎辯证法，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調和的，哪里有什么可以調和的矛盾呢？有的矛盾是對抗性的，有的矛盾是非對抗性的，但不能說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和可以調和的矛盾。

社会主义制度下（可能是共产主义制度下之誤——原抄者）虽然沒有战争，但是还有斗争，有人民内部各派斗争。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沒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这一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也是革命，还有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要經過很多阶段，也一定会有許多革命。

这里說到依靠群众的“积极活动”来及时克服矛盾（P.445）。所謂“积极活动”就應該包括复杂的斗争。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沒有力图保持过时的經濟关系的阶级”，这个說法对。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保守的阶层，还有类似的“既得利益集团”，还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之間的差别，虽然这些是非對抗性的矛盾，但是也要經過斗争才能得到解决矛盾。

我們的干部子弟很令人耽心，他們沒有生活經驗和社会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总还有先进的人和落后的人，有对集体事业忠心耿耿、勤勤恳恳、朝气蓬勃的人，有为名为利、为私为己、暮气沉沉的人。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每个时期，都会有一部分人乐于保存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农村中的富裕中农在許多問題上都有他自己的观点，他們不

能适应新的变化，并且其中有一部分人对这种变化进行抵抗，在广东农村中同富裕中农展开八字宪法的辩论就是证明。

P.453第三段倒是讲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斗争，讲得有点生气，但是接着后段中说：“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这个说法不适当，矛盾是动力，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矛盾的方法。

三十三、关于认识的辩证过程

P.446二段上说：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化“人们成为自己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人”，“能够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这些规律”。应该看到，这里要有一个过程，认识规律总是开始于少数人认识，然后是多数人认识，从不认识到认识要经过实践的过程和学习的过程，任何人开始总是不懂的，从来没有先知先觉，人们要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必须采取马列主义的态度，而且必须经过成功与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的胜利和失败，并且进行认真的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也是不行的。

所谓“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规律”这是不容易的，不经过一定的过程是不能实现的。446页上引恩格斯的话：“开始完全自觉的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才会在很大程度上，愈来愈大的程度上产生他们所希望的结果。”说是“开始”，是“愈来愈大”，这就比较准确。

教科书不承认现象和本质的矛盾，本质总是藏在现象的后面，只有通过现象，才能揭露本质。教科书没有写出人认识规律要有一个过程，先锋队也不能例外。

三十四、关于工会和一长制

说到工会的使命时，不讲工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不讲如何加强政治教育，只偏重讲福利。

全文提到“依据一长制的原则管理生产”。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企业都是实行一长制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原则应当同资本主义企业有根本的区别。我们所实行的在党委领导下厂长负责制就使我们同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制度严格地区别开来。

三十五、从原理原则出发不是马列主义的方法

从第二十章以后列举了许多规律。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而教科书的办法是不进行分析，文章写得很乱，它总是从规律、原理、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列主义从来所反对的方法。原理、原则的结果是要经过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的。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从现象出发找出原理、原则来。而教科书却与此相反，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形式逻辑说：“人都要死，张三是人，所以张三要死。”这是从人都死这个大前提出发得出的结论，这是演绎法。教科书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推理。他们不懂得大前提应当是研究问题的结果，必须经

过具体分析，才能够发现和证明原则、原理。

三十六、先进經驗能毫无阻碍地推广嗎？

P.461二段上說：“在社会主义国民經济中，能够在一切企业里毫无阻碍地推广科学的最新成就、技术发明和先进經驗。”可不一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有“学閥”，他們控制科学研究机关，压制新生力量。因此科学的最新成就也不是毫无阻碍的得到推广的。这种說法实际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有矛盾。任何新的东西出来，或者因为人們的不习惯，或者因为人們的不了解，或者因为同一部分人的利益相抵触，就会遇到阻碍。例如我們的密植、深翻这种事情本身沒有階級性，但还是受到了一部分人的反对和抵抗。当然社会主义社会里阻碍新东西的情形同資本主义社会是根本不同的。

三十七、关于計划工作

P.465上引用恩格斯的話，“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預定計划进行社会主义生产就成为可能。”这是对的，資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經济的平衡，是經济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經過計划来实现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我們对必要比例的認識要有一个过程，教科書在这里說：“自发性同自流性同生产資料公有制是不相容的。”但是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沒有自发性 and 自流量，我們对于規律的認識不是一开始就很完善，实际工作告訴我們在一个时期內，可以这样的計划，可以有这些人的計划，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計划，不能說这些人的計划都是合乎規律的，一定是

有些計划合乎規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規律，有些計划就不合乎規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規律。

认为对比例关系的認識不要有个过程，不要經過成功或失败的比較，不要經過曲折的发展，这都是形而上学的看法。自由是对必然的認識，但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透的，世界上沒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成了“先知先觉”。为什么教科書过去沒有出版？为什么出版了要一次再一次地修改？还不是过去認識不清楚，現在也还認識不完善嗎？拿我們自己的經驗來說，开始我們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認識，認識了一些，但也不是認識够了。如果說够了，那就沒有事做了。

P.466上說社会主义的特点是“經常自覺地保持比例”，这是一个任务，一个要求。要实现这个任务是不容易的。斯大林就說过，苏联的計划还不能說已經完全反映了規律的要求。

經常保持比例，同时也就是經常出現不平衡，因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务。社会主义經济发展过程中，經常出現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們按比例和綜合平衡。例如經济发展了，就到处都感到技术人員不够，干部太少，于是就出現干部的需要和干部分配的矛盾，就促进我們多办学校，多培养干部来解决这个矛盾，出現了不平衡，出現了不成比例，人們也就进一步認識客观規律。

在計划工作上，如果什么帳都不算，一切听其自然或四平八穩，要求絲毫的漏洞都沒有，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对的，其結果都会破坏比例。

計划是意識形态，意識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

用。过去我們計劃規定沿海地区不建設新的工业，一九五七年以前沒有进行什么建設，就誤了七年的時間，一九五八年以后才开始大的建設，两年中得到很大的发展。这就說明，象計劃之类意識形态的东西，对經濟的发展或不发展，对經濟发展的快慢有着多么大的作用。

三十八、关于生产資料生产优先增长和工农业并举

P.466上說到生产資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問題。

生产資料生产优先增长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經濟規律。資本主义社会如果不是生产資料生产优先增长也不能扩大再生产。在斯大林时期，由于特別強調了重工业的优先发展，結果在計劃中把农业忽略了。前几年，东欧各国也有过同样的問題。我們的办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和其他几个并举，每个并举中又有主要的方面。农业不上去，許多問題不得解决，我們提出工农业并举到現在已經四年了，真正实行是在一九六〇年。重視农业就表现在撥給农业鋼材的数量上，一九五九年給农业的鋼材只有五十九万吨，今年包括水利建設一共是一百五十万吨，这算真正是工农业并举了。

这里談到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五八年苏联生产資料生产增长一百零三倍，消費資料生产增长十五点六倍，問題是一百零三倍同十五点六倍的比例是否对重工业发展有利。要使重工业迅速发展，就要大家都有积极性，大家都高兴，而要这样，就必须使工业、农业同时并举，輕、重工业同时并举。

只要我們使农业、輕工业、重工业都同时高速度的向前发展，我們就可以保证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地改

善人民的生活。苏联与我們的經驗都证明农业不发展，輕工业不发展，对重工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三十九、分配决定論的錯誤观点

二十章中說：“利用工人对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是国营工业高涨的必要条件。”(P.474)二十一章中又說：“彻底实行經濟核算，利用把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同社会主义生产的利益結合起来的按劳分配的經濟規律，在为国家工业化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P.457)二十五章中又說：“社会主义的生产的目的一—使劳动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P.456)象这样地把“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绝对化起来，只会带来发展个人主义的危險。

P.452上又說：按劳分配規律“使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执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計劃，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决定性动力之一”，人們不能不問：“既然社会主义的基本經濟規律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方向，怎么又把个人物质利益說成生产的决定性的动力？”把消費品的分配問題当作决定性的动力，这是一种分配决定論的錯誤观点。按照馬克思在《哥达綱領批判》中所說的：“分配首先应当是生产資料的分配，生产資料在誰手里，这是决定性的問題，生产資料的分配决定消費品的分配。”把消費品的分配看成决定性的动力，是对馬克思上述的正确观点的一种修正，这是一种理論上的錯誤。

四十、政治挂帅和物質鼓励

P.445(第二段)中把党組織放在地方經濟机关之后，

地方經濟機關成了頭，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地方黨組織就不能當地掛帥，黨組織不掛帥要在當地充分動員一切積極力量是不行的。P.457雖然承認群眾的創造活動，但是說：

“群眾積極參加完成和超額完成國民經濟發展計劃的鬥爭，是加快共產主義建設速度的最重要條件之一。”P447也說“莊員主動性是發展農業的決定因素之一。”這裡把群眾鬥爭只看作“重要條件之一”的說法，違反了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這個原理。無論如何，不能認為歷史是計劃工作者創造的、而不是群眾創造的。

緊接着又提到：“首先要利用物質鼓勵因素。”好像群眾的創造性活動是要靠物質利益鼓勵出來的。這本書一有機會就講個人物質利益，好像總是想用這個東西來引人入勝，這反映了相當多的經濟工作人員和領導人員的精神狀態，也反映了不重視政治思想工作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不靠物質鼓勵，就沒有別的方法了。“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前半句是說要盡最大努力來生產。為什麼要把這兩句話分開，總是片面地講物質鼓勵呢？象這樣地宣傳物質利益，資本主義成了不可戰勝的了。

四十一、關於平衡和不平衡

P.432（末一段）寫得不對，資本主義技術的發展，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問題是它們這種平衡和不平衡同社會主義制度下技術發展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質上不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有技術發展的平衡，也有不平衡。例如解放初期，我們的地質工作人員只有二百多人，地質勘探的情況同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極不平衡，經過幾年來加強

工作，這種不平衡已經走上平衡，但是技術發展的新的不平衡又出現了。目前我國手工勞動還占很大比重，同發展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需要不平衡。因此有必要廣泛開展技術革命來解決這個不平衡。每逢一個新的技術部門出現以後，技術發展不平衡的狀況又會特別顯著，例如我們現在要搞尖端技術，也就感到許多東西不相適應。書中的這段話既否認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某種平衡，也否認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某種不平衡。

技術的發展是這樣，經濟的發展也是這樣。這本教科書中沒有接觸到社會主義生產發展的波浪式前進，說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一點波浪都沒有，這是不能設想的。任何發展都不是直線的，而是波浪形的、螺旋式的。我們讀書也是波浪式的，讀書之前做別的事情，讀了幾個鐘頭以後要休息，不能無日無夜地讀下去，今天讀得多，明天讀得少，而且每天讀的時候，有時議論多，有時議論少，這些都是波浪式，都是起伏。平衡是對不平衡說的，沒有不平衡就沒有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與不平衡的矛盾在各个方面、各個部門的各個環節都存在，不斷地產生，不斷地解決，有了頭年的計劃，又要有第二年的計劃，有了年度的計劃，又要有季度的計劃，有了季度的計劃還要有月的計劃，一年十二個月，月月要解決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計劃常常要修改就是因為新的不平衡的情況又出來了。

教科書中沒有充分運用辯證法，對各個問題沒有用辯證法來研究。關於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的這一章寫得很長，但沒有提出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

× × ×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平，物之情也”，因为消灭私有制，可以有计划的组织经济，所以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的客观规律，以造成相对的很多平衡。

生产力跑得快造成了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关系的情况，于是就要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求得适应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是相对的。生产力总是要不断前进，所以总是不平衡，平衡和不平衡是矛盾的两个侧面，其中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否则，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是普遍的规律，这个普遍的规律难道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吗？应当说社会主义社会同样适用这个规律。矛盾、斗争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计划工作中的各种平衡也是暂时的、过渡的、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不能设想有一种平衡是没有条件的，是永远的。

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做为纲要，来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未加研究，这是本书的缺点之一。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这两个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

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技术科学，自然科学；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了国家论，阶级斗争论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的社会主义部分所研究的是阶级斗争学说，国家论，革命论，党论，战略，策略等等。

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是情况不同，二是性质不同，许多基本范畴和规律，例如矛盾的統一，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定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四十二、关于所谓“物质刺激”

P.486上说：“就社会主义阶段，劳动尚未成为社会一切人员的生活的第一需要”，所以劳动的物质刺激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段的“一切成员”讲得太籠统了。列宁也是社会成员之一，能够说他的劳动没有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吗？

P.486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部分人：极大多数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义务；有些工作者却不老实对待自己的义务。这个分析得很对，但是要使一部分不老实对待自己义务的人转变过来，也不能光靠物质刺激，还必须批评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

书中这段还说到，较为勤勉积极的工作者，在同样的条件下能制造出更多的产品。是否勤勉积极，显然是决定于政治觉悟，而不决定于文化水平的高低。有些人文化技术水平高，可是不勤勉，不积极，另外有些人文化技术水平较低些，可是很勤勉，很积极。原因是前一种人觉悟低些，后一种人觉悟高些。

书上说对劳动的物质刺激“使生产增加”(P.486)，“是

刺激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p.487)但是物质刺激不一定每年都变化。人不一定天天、月月、年年都需要物质刺激。在困难的时候，减少一些物质刺激，人们也要干，而且干得很好。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他们不能解释同级工资中为什么人们的劳动有几种不同的情况，比如说，都是五级工，可是有一部分人干得很好，有一部分人就干得很不好，还有一部分人干得大体上还好。物质刺激都是一样，为什么有这样不同呢？照他们的道理是解释不通的。

即使承认物质刺激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要有另一个原则，在政治思想方面的精神鼓励的原则。同时，物质刺激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还应该讲集体利益，应该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体利益。

× × ×

在“对劳动的物质刺激，社会主义竞赛”的一节(P501)中关于竞赛，有些地方写得还不错，缺点是沒有讲政治。

一不死人，二不使身体弱下去，并且逐步略有加强，这两条是基本的，有了这两条，其他东西有也可以，沒有也可以，我们要使人民有些觉悟。教科书上对于为前途、为后代总不强调，只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常常把物质利益的刺激，一下子变成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有一点偷天换日的味道。

他们不讲全体人民的利益解决了，个人利益也就解决了，他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实际上是近视眼的个人主义。这种倾向，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时的经济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表现。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许多资产阶级

革命家的英勇牺牲，也并不是为个人眼前利益，而是为这个阶级的利益，为这个阶级的后代的利益。

在根据地的时候，我们实行供给制，人们还健康些，并不为了追求待遇而吵架。解放后实行工资制了，评了级，反而问题发生的多，许多人常常为了争级别而吵架，要做很多的说服工作。

我们党是连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当然，当时根据地里，整个社会并不是实行供给制，但是实行供给制的人员，内战时期多的时候有几十万人，少的时候也有几万人，抗战时期从一百多万人增加到几百万人，一直到解放初期，大致过的是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励。第二次国内战争后期，打了败仗，在这以前打了胜仗，在这以后还是打了胜仗，这并不是因为没有或者物质刺激，而是因为政治路线、军事路线错误或者正确，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有很大意义。

× × ×

二十八章说：“社会主义企业的工作者，从物质利益关心自己的成果，是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动力。”(P482)

二十九章说：“熟练劳动力的报酬较高，……这就刺激了劳动者提高文化和技术水平，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本质区别逐渐消失。”(P.501、503)

这段说熟练劳动的报酬较高，促使非熟练劳动者不断上进，以便进入熟练工人的行列。这个意思就是说，为了多挣钱就来学文化，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个人进学校学技术，学文化，首先应认为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工

业化，为了为人民服务，为了集体利益，而不应该首先为了高工资。

二十九章中还說：“按劳分配是推动生产发展的最大力量。”(P. 526)而在526的末段，在說明社会主义制度下，工資不断提高以后，未修訂的三版本，还有“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地方，就在这里。”这样的話，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根本优越的地方就在于工資的不断提高，很不对。工資是消費品的分配，沒有生产資料的分配，就不会有产品的分配，不会有消費品的分配，前者是决定后者的。

四十三、关于社会主义企业中人与人的关系

P. 500上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經濟领导者的威信，取决于他們联系群众的程度，取决于人民对他們的信任。”这句话讲得好，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須做工作。我們的經驗——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是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紀律。不能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員的创造性的合作。

既然体力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員是統一的生产集体的成員，“为什么社会主义企业必須实行一长制而不能实行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制，”即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負責制呢？

政治弱，就只好讲物质刺激了，所以接下去馬上就說：“彻底实行使工作者从个人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的原则……是进一步掌握提高社会主义生产的主要源泉。”

四十四、关于突击和赶任务

P. 505上說：“消除赶任务的现象，按图表均衡的进行生产。”未修訂的三版上这句话是：“要同突击现象作斗争，要按預定的进度表均衡地工作。”根本否认突击，赶任务，讲得太绝对了。

不能完全否认突击，突击和不突击是对立的統一。在自然界中有和风細雨，也有疾风暴雨，突击和不突击也是波浪式起伏，在生产方面的技术革命，常常发生需要突击的情形，农业生产要搶季节，唱戏要有高潮，否定了突击，实际上就是不承认高潮。苏联要赶美国，我們想不用苏联那么多时间达到苏联这样高的水平，这些也都是突击。

社会主义竞赛就是落后者赶上先进者，就是要經過突击才能达到的。人与人，組与組，企业与企业，国家与国家，都是要竞赛，要赶先进，也就会有突击。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搞建設，搞革命，例如依靠行政命令进行土改、合作化，会造成減产的損失。这是因为不发动群众的緣故。不是因为突击的緣故。

四十五、关于价值規律与計划工作

P. 521用小字印的一段，正确。有批評，有議論。

价值規律作为計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規律作为計划工作的重要依据，我們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規律的要求，而是依据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依据我們扩大生产的需要。如果单从价值規律的观点来看，我們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結論，就必然把去年大

办钢铁说成是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来看，大办钢铁好象是吃了亏的，但从整体和长远来看，这是很值得的，因为大办钢铁的运动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局面打开了。在全国建立了许多新的钢铁基地和其他工业基点，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大大加快我们的速度。

一九五九年冬，全国参加搞水利的有七千五百多万人，用搞这样两次大规模的运动的办法，我们的水利问题就可以基本上得到解决。从一年，二年，或者三年来看，花这么多的劳动，粮食单位产品的价值当然很高，但是从长远来看，粮食更可以增加得多，增加得快，农业生产可以更稳定，那么每个单位产品的价值，也就更便宜，也就更能够满足人民对粮食的需要。

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多为重工业创造一些积累，从长远来看，对人民是有利的，只要农民和全国人民了解到国家“赚或者是赔了钱”是用来干什么的，他们就会赞成，不会反对。农民中自己已经提出了支援工业的口号，就是证明。列宁和斯大林都说过：“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要向国家进贡。”我国绝大多数农民是积极“进贡”的，只有富裕中农里面百分之十五的人不高兴，他们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一套。

总之，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当然价格问题是我們要注意的。前几年我们曾经提高生猪的收购价格，对于发展养猪有积极作用，但是象现在这样大量的普遍的养猪，主要还是靠计划。

P521上说到集体农庄市场上的价格问题，他们那种集

体农庄市场自由太大了，对这种市场的价格只用国家的经济力量来调节是不够的，还要有领导，有控制。我国初级市场的价格由国家规定一定的幅度，不让小自由成为大自由。

P522上說：“由于掌握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的作用并不带来资本主义下的那种生产无政府状态，产生浪费社会劳动力的现象。”这种说法，把价值规律的作用夸大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发生危机，主要不是我们掌握了价值规律，而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全国有计划的进行生产和分配，没有自由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等等，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当然也是由于它的所有制决定的。

四十六、关于工资形式

P530讲工资形式主张以计件工资为主，计时工资为辅。我们是计时工资为主，计件工资为辅，片面强调计件工资会造成新老工人之间、强弱劳动之间的矛盾。助长部分工人中“为挣大钱而斗争”的心理，不是首先关心集体事业，而是首先关心个人收入。有的材料说明计件工资制还有碍于技术革新和机械化的采用。

书上承认在生产自动化的情况下，不宜于实行计件工资，一面说要广泛发展生产自动化，一面又说要广泛采用计件工资形式，这就自相矛盾起来了。

我们实行计时工资加奖励。这两年的年终跃进奖，就是这种奖励，除了国家工作人员、教育工作人员以外，其他职工中普遍有年终跃进奖，谁发多，谁发少，由每个单位的职工自己评定。

四十七、关于价格的两个问题

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

一个消费品的价格问题，书上说：“社会主义一贯实行降低人民消费品价格的政策。”（P535）我们的办法是稳定物价，一般不涨也不降，我国工资水平虽然比较低，但是普遍的就业，物价低，房租低，职工生活水平并不很坏。究竟是不断降低物价好，还是不涨不降好，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另一个是重工业品和轻工业品的问题，相对来说，他们是重工业品的价格低，轻工业品的价格高。我们是重工业品的价格高，轻工业品的价格低。为什么这样？究竟怎样才好，也值得研究。

第三部分（从第30章到第34章）

四十八、关于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

P.547说到在建设，反对分散建设基金，如果说大建设单位，同时搞得很多，因而都不能按期竣工，这当然是要反对的。如果因而取消建设中的中小型企业，那就不对。我国新的工业基地主要是在一九五八年大量发展中、小型企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根据初步安排，今后八年中钢铁工业要完成二十九个大型、近一百个中型、几百个小型钢铁基地的建设。中小型对钢铁工业的发展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拿一九五九年来说，全年生产的生铁，是二千多万吨，其中一半是由中小型生产的。今年中小型对钢铁工业的发展还是要起很

大作用，许多小的会变成中的，许多中的会变成大的，落后的变成先进的，土的变成洋的，这是客观发展的规律。

我们是要采用先进的技术，但不能因此而否定落后的技术在一定时期的必然不可避免性。从有历史以来，在革命战争中，总是拿武器差的人打败拿武器好的人。内战的时候，抗日战争的时候，解放战争的时候，我们没有全国的政权，没有近代化的兵工厂，如果一定要有了最新武器才能打仗，那就等于自己解除了武装。

我们要实现象教科书上所讲的全盘机械化（p.420），看来第二个十年还不行，恐怕要在第三个十年中间。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因为机械不够，半机械化和改良工具，还是我们要提倡的，现在我们还一般地提倡自动化。机械化要讲，但是不要讲得过火，机械化、自动化讲得过火了，会使人看不起半机械化和土法生产。过去就曾经有过这样的偏向，大家都片面地追求新技术、新机器，追求大规模、高标准，看不起土的，看不起中小的，提出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以后，这个偏向才克服。

在农业上我们现在不提化学化，一是因为多少年内还不可能生产很多的化肥，已有一点化肥，但只能集中使用于经济作物。二是因为提了这个，大家眼睛都看着它，就不注意养猪。无机肥料也要有，但是如果只靠它而不同有机肥料结合起来，会使土壤硬化。

教科书中说，在一切部门采用新技术。但这是不容易作到的，总是要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而且在利用了某种新机器的同时，总是有许多旧机器。教科书中说到，一方面新建企业，并对现有工厂进行设备更新，同时充分合理地使用

现有的机器和机械（p.427）。这样的说法就对了，将来永远都会是如此。

至于大的洋的方面，我们也一定要自力更生地搞，一九五八年提出破除迷信、自己动手的口号，事实证明自己来搞还（是）可以做到的。过去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靠采用先进技术，在生产上赶上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苏联也靠采用先进技术而赶上了资本主义国家。我们也一定这样做，也一定能够做到。

四十九、先有拖拉机？还是先有合作化？

p.563上說：“在一九二八年全盘集体化的前夕，春季作物的翻耕工作有百分之九十九还是采用木犁和馬拉犁。”这个事实推翻了教科书上在很多地方关于“要有拖拉机才能合作化”的观点。而同頁上所說：“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发展农业生产力和农业技术的进步开辟了广泛的场所”，則是对的。

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规律。东欧一些国家农业合作化搞得很慢，到现在还没有完成，主要不是由于它們没有拖拉机（相对的说来，它們比我們多得多），主要是它們的土地改革是从上而下的恩賜的，它們沒收土地是限額的（有的国家一百公頃以上的土地才沒收），是用行政命令来进行沒收工作的，土地改革以后又没有趁热打铁，中間整整間歇了五、六年。我們則与它們相反，实行群众路綫，发动貧农、下中农展开阶级斗争，夺取地主阶级的全部土地，分配富农的多余土地，按人口平均土地（这是农村的一个极大革命）。土改以后，紧接着开展广泛的互助合作运动，由此一步一步的不断前进地把

农民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我們有了强大的党，强大的军队，我軍南下时，各省都配备了从省、地到县、区整套的地方工作的干部班子，而且一到目的地，立即深入农村，訪貧問苦，扎根串連，把貧农、下中农的积极分子組織起来。

五十、关于“一大二公”

苏联的集体农庄合并过两次，由二十五万多合并为九万三千多个，又合并为七万个左右，将来势必还要扩大。教科书上：“要加强和发展各集体农庄的生产关系，組織集体农庄之間的公用生产企业等等。”（p.568）事实上有些地方和我們的方法类似，但是不用我們的說法而已。它的将来，即使办法和我們一样，看来也不会用“公社”的名称。說法和名称的不同，包括一个实质的問題，就是群众路綫的实行或不实行問題。

当然，苏联集体农庄扩大規模，按戶数、人数来说，可能不会象我們这样大，因为他們农村人口稀、土地多，但能因为这样就說現在集体农庄再不需要扩大了么？我們的新疆、青海这些地方，虽然人少地多，但仍旧需要扩大公社，我国南方几省有些县，如閩北的一些县也是在人少地多条件下搞起大公社的。

扩大公社是一个重大問題，量变了，一定会引起质变，会促进质变。我們的人民公社，就是“一大二公”，首先是大，接着就必然提高“公”的水平，也就是說必然带来部分质变。

五十一、特別強調物質利益的原因何在？

在集体农庄制度一章內，反复讲个人物质利益，如p567、

571, 等等。现在特别强调物质利益总有个原因。斯大林时代过分强调集体利益, 不注意个人所得; 过分强调公的, 不注意私的; 现在走到了反面, 又过分强调个人物质利益, 不大注意集体利益, 这样强调下去, 又一定会走到自己的反面。

公是对私说的, 私是对公说的, 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 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从来讲公私兼顾, 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 又说过先公后私, 个人是集体的分子, 集体利益增加了, 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

两重性, 任何事物都有, 而且永远有。当然, 总是有不同的具体形式表现出来, 因此性质也各有不同。例如遗传和变异也是对立统一的两重性, 如果只有变异的一面, 没有遗传的一面, 那么下一代的生物和上一代的生物就完全不同, 稻子就不成其为稻子, 狗也不成其为狗, 人就不成其为人了。保守的一面, 可以起好的积极的作用, 可以使不断变化中的生物在一定时期内固定起来, 或者稳定起来, 所以稻子改良还是稻子。但是如果只有遗传的一面, 没有变异的一面, 那么就沒有改进, 发展永远停顿下来了。

五十二、事在人为

书上说: “集体农庄有形成级差地租的经济条件和自然条件。”(p.577)级差地租不完全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 其实还是事在人为, 例如河北省省内京汉沿线的机井很多, 津浦沿线的机井却很少。自然条件相似, 交通一样方便, 但是土地的改良却是各有不同, 这里可能有土地利于、不利于改良的原因, 也有可能存在着不同的历史原因, 但是最重要的还

是“事在人为”。

同时, 上海郊区, 有的养猪养的好, 有的却养的不好, 上海崇明县原来說那里各种自然条件中, 例如湖多, 不利于养猪, 现在打破了畏难情绪, 对养猪事业采取了积极态度以后, 却看到这些自然条件不但不妨碍养猪, 反而有利于养猪。实际上, 深耕细作, 机械化、集体化也都是事在人为。北京昌平区常闹水旱灾害, 修了十三陵水库, 情况改变了, 还不是“事在人为”吗? 河南省计划在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以后再用三年沿黄河完成几个大型水渠的建设, 也都证明“事在人为”。

五十三、关于运输和商业

运输包装不增加使用价值, 但是增加价值。运输包装所用的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的一部分, 沒有运输包装, 生产过程就沒有完成, 不能转到消费过程, 使用价值虽然生产出来了, 也不能說实现。例如煤炭, 在矿山开采出来了, 如果摊在矿山, 不用铁路、輪船、汽车运到用户手中, 煤炭的使用价值是完全不能实现的。

585頁上說, 他們的商业系統有两套: 即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 因此还有所謂“无組織的市場”, 即集体农庄市場。我們是一套, 把合作社商业合并于国营商业。现在看来, 一套好办事, 并且各方面节省得多。

p.587提到对商业的公共监督, 我们对商业的监督, 主要依靠党的领导, 政治挂帅, 群众监督这一套。商业工作人员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 沒有他們的劳动, 生产就不能转为消费(包括生产的消费和生活的消费)。

五十四、关于工农业并举

p.623上說到生产資料优先增长的規律，未修訂的三版本中在这里也特別提出：“生产資料优先增长，意味着工业的发展速度快于农业”。

工业的发展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強調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則一定会发生問題。拿我国的辽宁来說，这个省的工业很多，城市人口占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过去总是把工业放在第一位，沒有同时注意大力发展农业，結果本省的农业不能給城市保证粮食、肉类、蔬菜的供应，总是要从别的省运粮食，运肉类，运蔬菜。主要的問題是农业劳动力紧张，沒有必要的农业机械，使农业的生产受到限制，增长較慢。我們过去沒有了解到，恰恰是东北这样的地方，特别是辽宁这样的省，应当好好抓农业，不能只強調抓工业。

我們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謂“同时并举”，并不否认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并不是平均使用力量，例如今年我們估計可能生产鋼材一千四百万吨左右，拿出十分之一的鋼材来搞农业技术改造和水利建設，其余十分之九的鋼材主要还是用于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設，这在今年的条件下就是工农业并举了。这样做，当然不会妨碍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加快发展农业。

波兰有三千万人口，只有四十五万头猪，現在肉类供应非常紧张，看来波兰現在还没有把发展农业放到議事日程上来。

p.624上說：“在个别时期，要加速落后了的农业和輕工业以及食品工业的发展。”这是好的。但是农业和輕工业的落后，所造成的比例失調，不能說成只是“局部比例失調”現象，这种比例失調不是局部的問題。

p.625上說：“必須合理的分配投資，使重工业和輕工业不論何时都保持正确的比例关系。”这段只讲重工业和輕工业，沒有讲工业和农业。

五十五、关于积累水平問題

在波兰，这个問題現在成为很大的問題。哥穆尔卡起初強調物质刺激，增加工人工資，不注意提高工人的觉悟，結果工人只想多要錢，不好好干。工資的增长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造成了吃老本的情况，現在逼着他不得不出来反对物质刺激，提倡精神鼓励。哥穆尔卡也說：“錢买不到人心”。

特別強調物质刺激，看来总是难免走向自己的反面。开了很多支票，高薪阶层当然滿意，广大工人、农民要求兌現而不能兌現的时候，就会被迫地走到強調物质刺激的反面。

根据p.631上所說情形，苏联积累資金約占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我国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一九五七年是百分之二十七，五八年是百分之三十六，五九年是百分之四十二。看来今后我国积累比重經常保持在百分之三十以上或者是更多些，是可能的。主要的問題是生产大发展，只要生产增加了，积累比重大一点，还是可以改善人民生活的。

厉行節約，积累大量的物力和財力，这是經常的任务，如果以为只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应当这样做，那是不对

的。难道困难少了，就不要节约，不要积累了么？

第四部分（从第35章到结束语）

五十六、关于共产主义的国家问题

p.695上說：“在共产主义高級阶段……国家将成为不需要的东西而逐渐消亡。”但是国家的消亡还需要一个国际条件，人家有国家机器，你没有，这是危险的。p.640上說，即使到共产主义建成后，只要帝国主义国家还存在，国家就还是必要的。这个提法对。紧接着书上又說：“但是国家的性质和形式将取决于共产主义制度的特点。”这句话不好懂，国家的性质是压迫敌对势力的机器，国内即使没有需要压迫的敌对势力了，对于国外的敌对势力，国家的压迫的性质也还没有变。所谓国家的形式不外为军队、监狱、捉人、杀人等等。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家的这些形式到共产主义有什么不同呢？

五十七、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

p.641上說：“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敌对的阶级”，但是“还有敌对阶级的残余。”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的，只能說不需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社会革命，但是还要有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的社会革命。

书上在这里接着声明：“这并不是說社会沿着通向共产主义道路发展就不需要克服内部矛盾。”不过是附带的声明罢了。这本书虽然有些地方也承认矛盾，但不过是附带的提

起，說明問題不从分析矛盾出发，这是这本书的一个缺点。当作一门科学，就应当从矛盾分析出发。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因为生产高度自动化，要求人们的劳动和行动更准确，那时的劳动纪律会比现在更加严格了。

现在我们說共产主义社会分两个阶段，即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这是馬克思他們根据当时社会发展的条件所預見到的。进到高级阶段以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一定会出現新的阶段，新的目标、新的任务一定又会提出来。

五十八、集体所有制的发展前途

p.650上說：“集体农庄、合作社生产关系的形式完全符合农村目前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需要。”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有一篇苏联的文章，介紹了紅十月集体农庄的情况，說：“原来几个农庄不合并时，很多事情不好办，合并以后，这些事情都好办了。”又說：现在一共一万人，计划在中心建設一个住三千人的居民点。这个材料可以說明现在集体农庄的形式已經不完全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了。

书上这段說：“要全力加强和过渡发展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既然需要发展，要过渡，怎么全力加强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制度要讲巩固，但不能讲得过火。书上讲了模糊的前途，但一讲到具体措施就不清楚了。从某些方面（主要是生产方面）看，他們没有停顿，但是在生产关系方面，可以說基本上停顿不前了。

书上說，要把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但是在我們看来，首先必須把集体所有制变成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所谓把集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就是把

农业生产资料统统变为国有，把农民统统变为工人，由国家统一包起来，发给工资。现在全国农民每人平均每年的收入是八十五元（六十五元），将来达到每人一百五十元，而且大部分由社发给的时候，就可以实行基本上社有。这样，再进一步变为国有，就好办了。

五十九、关于消灭城市和农村的差别

p.651的后一段对农村建设的设想很好。

既然要消灭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书上说是“基本差别”），为什么又特别声明并不是“降低城市作用。”将来的城市可以不要那么大，要把大城市居民分散到农村去，建设许多小城市，在原子战争的条件下，这样也比较有利。

六十、关于社会主义各国建立经济体系问题

p.659上说：“每个国家都可以集中自己的人力、财力来发展本国最有利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有生产经验和干部的部门，而且个别国家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它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

这个提法不好。我们甚至对各省都不这样提。我们提倡全面发展，不说每个省份不必生产能靠其它省份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我们要各省尽量发展各种生产，只要不妨碍全局。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独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较快。我国自秦以来，形成大国，在很长时间内，全国大体上保持统一局面，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控制太死，地方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拉拉，经济发展很慢。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们要做到全国是统一的，各省又是独立的，

是相对的统一，又是相对的独立。

各省服从中央决议，接受中央控制，独立解决本省的问题。而中央重大问题的决议，不独是中央，而是同各省商量共同做出的，例如庐山会议的决议就是如此，它既合乎全国的需要，也合乎各省的需要。能认为只有中央需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地方就不需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了么？我们是在全国统一计划下，提倡各省尽量各搞一套。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只要能够就地取材，就地推销，凡能办的事情，就都可以尽可能去办。以前是担心各省都发展了各种工业，象上海这样的城市的工业品会没有人要，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的。上海已经提出向高、大、精、尖发展的方针，它们还是有事情可做的。

为什么不提倡各国尽量搞，而提倡可以不必生产能依靠其它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呢？正确的办法是应当各国尽量搞，以自力更生为主；自己尽可能的独立的搞，以不依赖别人为原则，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应当尽可能的搞好，吃饭靠外国、外省危险得很。

有些国家很小，确实象书上所说的情形：“发展所有工业部门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也是力所不能胜任的。”那当然不要勉强去搞，我们国内有些人口少的省，如青海、宁夏，现在也很难什么都搞。

六十一、社会主义各国的发展能够“拉平”吗？

p.660第三段：“使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总的水平逐渐拉平。”各国人口不同，资源不同，历史条件不同，革命有先进的和落后的区别，怎样拉得平呢？一个父

亲生十几个儿子，有的高，有的低，有的大，有的小，有的聪明些，有的愚蠢些，怎么能拉平呢？“拉平”是布哈林的均衡论。社会主义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一国之内的各省、一省之内的各县都不均衡。拿广东的卫生来说，佛山市和鼓乐社搞得不好，因此佛山市和广州不平衡，鼓乐社和韶关不平衡。反对不平衡是错误的。

六十二、根本问题是制度问题

p.557说，社会主义国家贷款和帝国主义不同。这个叙述是符合事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总比资本主义国家好，我们懂得这个原则区别是根本制度问题，制度决定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社会主义国家总是要同帝国主义国家相对立，妥协总是暂时的。

六十三、关于两个世界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

p.658上说：“两个世界体系的竞赛。”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提出了两个世界市场的论点。教科书在这里强调了两个世界体系的和平竞赛，强调在两个世界体系之间建立“和平发展”的经济关系。这是把实际存在的两个世界市场变成了在统一的世界市场中的两个经济体系，这是从斯大林观点的后退。

在两个经济体系之间，其实不只是竞赛，而且有激烈的广泛的斗争，教科书避开了这个斗争。

六十四、关于对斯大林的批评

p.680上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

作，正如斯大林的其它著作一样，有些错误的论点。p680上所指的两条罪状不足以服人。

一条罪状说斯大林抱着这样的观点：“商品流通似乎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逐渐过渡到工农业直接进行商品交换的必然性已经成熟。”

斯大林在这本书里说过，有两种所有制，就要有商品生产。他说，在集体农庄的企业中，虽然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可是产品都是个别集体农庄的财产，因为集体农庄中的劳动，也如种子一样，是他们自己所有的，而国家交给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土地，集体农庄事实上是作为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的。在这样的条件下，“集体农庄只愿意以商品的形式把自己的产品转让出来，愿意以这种产品换取他们所需要的商品，现时除通过买卖的交换形式以外，与城市其它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

斯大林批评了苏联当时主张取消商品生产的观点，认为当时商品生产同三十年前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发展商品流通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

教科书说，斯大林似乎主张立即消灭商品。这个罪状很难成立。至于产品交换问题，在斯大林只是一种设想，他并且说过：“推行这种制度，无须特别急忙，要随着城市自制成品的积累的程度而定。”

另一条罪状是低估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特别是对生产资料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生产领域中，价值法则不起调节作用。起调节作用的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国家计划经济。”教科书提出的这个论点，其实就是斯大林的论点。虽然教科书认为生产资料是商品，但是第一不能不认为在

全民所有制范围内，生产资料买卖并不改变所有权。第二，不能不承认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和流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这些论点，同斯大林的论点在实际上是一致的。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一个真正区别是，前者反对把拖拉机等生产资料卖给集体农庄，而后者则把这些东西卖给集体农庄。

六十五、对教科书的总的看法

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没有马列主义，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马列主义的。但是也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是马列主义的，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离开马列主义的。基本上否定这本书，还不能做这个结论。

书上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经济，不是为少数剥削阶级谋利的经济。书上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不能说完全是错误的，这本书基本论点说的是这个。书上也说明了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等等。由这些方面看，这本书还是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至于在承认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之后，如何按比例，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各有各的办法。

但是这本书有些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书上不强调政治挂帅，群众路线，不讲两条腿走路，片面地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宣扬物质刺激，突出个人主义。

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书上不是从矛盾出发，他们实际上是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实际上，他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有阶级斗争，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残余的斗争。但是他们不承认。他们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有三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

制和个人所有制。当然，这种个人所有制和集体化以前的个人所有制有所不同。那时，农民的生活完全建立在个人所有制上，现在是脚踏两只船，主要是靠集体，同时又靠个人。有三种所有制就一定有矛盾和斗争。教科书上不讲这种矛盾斗争，不提倡群众运动。书上不承认先使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使整个社会成为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然后再向共产主义过渡。

书上用什么“接通”、“融洽”的模糊说法来代替一种所有制变为另一种所有制、一种生产关系变为另一种生产关系的观点。

就这些方面来看，这本书有严重的缺点，有严重的错误，是部分的离开了马列主义。

× × ×

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没有说服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书上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具体分析出发，提出问题，研究问题，它总是从概念出发，从定义出发，只下定义，不讲道理。其实定义应当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书上凭空的提出一连串规律，都不是从具体历史发展过程分析中发现和证明的规律。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不从具体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这本书的写法不是势如破竹、高屋建瓴，问题不突出，文章没有说服力，读起来没有兴趣，文章不讲逻辑，甚至形式逻辑也不讲。

这本书看来是几个作者分别一章一章地写的，有分工而无统一，没有形成教科书的体系，加上用的是从定义出发的方法，使人觉得是一本经济学词典。作者相当被动，很多地

方自己同自己矛盾，后面同前面打架。分工合作，集体写作，虽然是一种方法，但最好的方法是以一个人为主，带几个助手写，象马克思他们写出来的书，才是完整、严密、系统、科学的著作。

写书有批判对象，才有生气。这本教科书虽然也说了些正确的話，但没有展开对錯誤观点的批判，所以看起来很沉闷，使人感到不高兴。

許多地方使人覺得这本书說的是书生的話，而不是革命家的話。经济学家不懂得經濟实践，并不算真正內行。看起来这本书是反映了这种情况：作实际工作的人沒有概括的能力，沒有概念和規律这一套，而作理論工作的人又沒有实践的經驗，不懂得經濟实践。这两种人沒有結合起来，也就是理論与实践沒有結合起来。

这本书表明作者沒有辯证法，写經濟学教科书也要有哲学头脑，要有哲学家参加，沒有哲学头脑的作家参加，要写出好的經濟学教科书是不可能的。

× × ×

这本教科书的初版是一九五五年初，但主要的骨架似乎在这以前即定下来了，看来斯大林在当时定下来的架子就不大高明。

苏联現在也有人不同意这本书的写法，格·科兹洛夫：《論社会主义政治經濟学的科学教程》一文，对这本书的批評提出了帶根本性的意見，他指出这本书在方法上的缺点，他主张从分析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來說明規律，他提出了結構方面的建議。

从科兹洛夫这些人的批評来看，在苏联也可能产生作为

这本教科书的对立面的另一本教科书来出，有对立面就好了。

初步讀过这本书，可以了解到他們的写法和观点，但是还不能算是研究，最好将来以問題和論点为中心，仔細研究一下，并且搜集一些材料，也看一下不同意这本书的观点的其它发表的文章和书报，在有爭論的問題上，有些什麼不同的意見都可以了解一下，問題要弄清楚，至少也要了解兩方面的意見。

我們要批評和反对錯誤的意見，但也要保护一切正确的东西。要勇敢也要謹慎。

无论如何，他們写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經濟学，总是一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問題，有了这本书，至少可供我們議論，并且由此引起进一步的研究。

六十六、关于政治經濟学教科书的写法

苏联教科书从所有制出发写，原則上是可以的，但是可以写的更好些，馬克思研究資本主义經濟，也主要是研究資本主义生产資料所有制，研究生产資料的分配如何决定产品的分配。在資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是同一个基本矛盾。馬克思从商品出发，来揭露在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后面所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虽然还有两重性，但是由于生产資料公有制的建立，由于劳动力已不是商品，社会主义商品的两重性已不同于資本主义商品的两重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經不再被商品这种物与物之間的关系所掩盖。因此，如果还照抄馬克思的办法从商品出发，从商品的两重性出发，来研究社会主义的經濟，可能会反而把問題模糊起来，使人不容易了解。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按照斯大林的说法，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即所有制、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产品分配。我们写政治经济学也可以从所有制出发，先写生产资料私有制改变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把官僚资本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把地主土地私有制变为个体农民私有制，再变成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然后再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矛盾，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同时也要写全民所有制本身的变革，如下放体制、分级管理、企业自治权等。在我们这里同时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但是有的是中央部门直接管理，有的由省、市、自治区管，有的由地方专区来管，由县管、公社管的企业，有的是半全民半集体的性质。无论是中央管的或各级地方管的，都在统一领导下，而且具有一定的自治权。

关于在生产和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教科书中除了“同志式的合作互助关系”这样的话以外，根本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没有在这方面分析和研究。所有制的问题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在一定所有制下的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之内，总有限度，但是在这一一定时期内，人与人在生产劳动中的关系却可能是不断变革的。我们对全民所有制的企业的管理，采用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党的领导人员、工人群众和技术人员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变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样一套。

关于产品分配，要重新再写，换一种写法，应该强调艰

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不能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这样的为个人不为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但如果只看到足下，不想到前途，不想到远景，那还有什么旅行的兴趣和热情呢？

六十七、关于从现象到本质的研究方法

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

在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研究战争的问题也是从现象出发的。敌人大，我们小，敌强我弱，这是当时最重大的问题，大家都能看得到的现象。我们就是从这个现象出发来研究和解决问题的。研究我们在小而弱的情况下，如何来战胜大而强的敌人。我们指出，我们虽然小而弱，但是有群众的拥护，敌人虽然大而强，但有空子可钻。拿内战时期来说，敌人有几十万，我们只有几万，战略上是敌强我弱、敌攻我防，但是，他们进攻我们，就要分成好几路，各路人要分成好多个部队，常常是一个队进到一个据点，而其它队还在运动当中，我们就把几万人集中去打他一路，而且集中大多数人吃他这一路中的一点，用一部分人去牵制还在运动中的敌人。这样，我们在这点上就成了优势，成了敌小我大，敌弱我强，加上他到一个地方情况不熟，群众不拥护他们，我们就完全可以消灭这部分敌人。

× × ×

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意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规律是在事物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

西，不是偶然出現的东西，事物反复出現，才成为規律，才能够被人認識。例如資本主义的危机在过去是十年左右一次；經過多次反复，就有可能使我們認識到資本主义社会中經濟危机的規律。土地改革中要按人口分配土地，而不能按劳力分，这也是經過反复后，才認識清楚的。第二次国内战争后期，“左”傾冒险主义路綫的同志主张按劳力分配土地，不贊成按人口平分土地，并认为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是階級观点不明确，群众观点不充分，他們的口号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其它人按劳力分。这种办法事实证明是錯誤的。土地应该怎样分法是經過多次反复才弄清楚的。

× × ×

馬克思主义要求邏輯和历史一致。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反映。邏輯是从历史中来的，而书中堆滿材料，不分析，沒有邏輯，看不出規律，不好。但是沒有材料也不好，那就使人只看見邏輯，看不見历史，而且这种邏輯，只是主观主义的邏輯。这本教科书的缺点正在这里。

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資本主义发展史，研究历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規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規律研究清楚了，社会普遍的規律就容易認識了。要从研究許多特殊中間看出一般来，特殊規律搞不清楚，一般規律是搞不清楚的。例如研究动物的一般規律，就必须分別研究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等等特殊規律。

六十八、哲学要为当前政治服务

任何哲学都是为当前政治服务的。

资产階級哲学也是为当前政治服务的。而且每个国家，每个时候都有新的理論家，写出新的理論，来为他們当前的政治服务。英国曾經出現过培根和霍布斯这样资产階級唯物論者，法国十八世紀又出現了百科全书派的唯物論者，德国和俄国资产階級也有他們的唯物論，他們都是资产階級派唯物論者，他們都是为当时的资产階級政治服务的，所以并不因为有了英国资产階級唯物論就不要法国的，并不因为英国、法国的就不要德国的和俄国的。

无产阶级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是更要密切地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对于我国來說，馬、恩、列的书必須讀，这是第一，但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論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

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单有馬克思、恩格斯，沒有列宁写出的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〇五年和以后出現的新問題；单有一九〇七年的“唯物論和經驗批判論”就不足以应付十月革命前后产生的新問題，适应这个时候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論”、“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問題”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动派，保卫列宁主义。我們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日战争初期写了“实践論”和“矛盾論”，这些都是适应当时需要而不能不写的。

現在我們已經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現了新的一系列的問題，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

补 遺

一、关于我国工业化問題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大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就宣布实现了工业化。我们很快就可以达到这个标准，但即使这样，我们也还不宣布实现了工业化，我们还有五亿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如果工业产值占百分之七十就宣布实现了工业化，不仅不能确切地反映我国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而且可能由此产生松劲情绪。

我们“八大”一次会议曾说：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又说：要在十五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内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两个说法有点矛盾，没有完备的工业体系怎么能说有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呢？现在看来，我们再有三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可以超过英国，然后再有五年就可以实现建立工业体系的任务。

长时期内，我们这个国家不叫工业国，即使钢有了一亿多吨，也还是这样。如果按人口平均的产量超过英国，那么我们的钢产量最少需要三亿五千万吨。

找一个国家来竞赛，这个方法很有意义。我们永远提赶英国，第一步按主要产品的产量来赶，下一步按人口平均产量来赶。造船业，汽车制造业，我们还比他们落后得很远，我们一定要争取赶上它。日本这样的小国都有四百万吨的商船了，我们这样大的国家，没有这样的轮船运货，说不过去。

一九四九年，我国拥有机床九万多台。一九五九年增加

到四十九万多台。日本一九五七年有六十万台。拥有机床多少，这是工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我国机械化的水平很低，从上海就可以看出来，根据最近调查材料说，那里的现代企业中，机械化劳动、半机械化劳动、手工劳动各占三分之一。

苏联工业劳动生产率现在还没有超过美国。我们则差得更远，人口虽然多，但是劳动生产率比不上人家。从一九六〇年起十三年内还要紧张的劳动。

二、关于人的地位和能力

(p488) 说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地位只决定于劳动和个人的能力。未必如此，聪明人往往出在地位低、被人看不起、受过侮辱而且年青的人中。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旧社会的规律，被压迫者文化低，但是聪明些；压迫者文化高，但总是愚蠢些。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高薪阶层也有些危险，他们的文化知识多些，但是同那低层比较起来，要愚蠢些。我们的干部子弟就不如非干部子弟。

有很多创造发明，都是在小厂里出来的，大厂设备好，技术高，因此往往架子大，安于现状，不求进取，他们的创造性往往不如小厂多。最近常州有一个纺织厂创造了一个提高织布机效力的技术装置，有近乎使纺纱、织布、印染得到能力平衡。这个新技术，不在上海、天津创造出来，而在常州这样小地方创造出来。

知识是经过困难得到的。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但是因为丢了官，“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象“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孔

子也是因为在许多国家受到了挫折，才转过来搞学问，他团结了一批“失业者”，想到处出卖劳动力，可是人家不要，一直不得志，没有办法了，只好收集民歌（诗经），整理史料（春秋）。

历史上许多先进的东西不出在先进的国家，而出在比较落后的国家，马克思主义不出在当时资本主义比较发展的国家——英国、法国，而出在资本主义只有中等发展水平的德国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科学发明也不一定出于文化高明的人，现在许多大学教授，并没有发明，而普通的工人反而有发明。当然我们并不是否定工程师和工人的差别，不是不要工程师，但是这里确实有个问题。历史上常常是文化低的打败文化高的，在我们的国内战争中，我们的各级指挥员，从文化上说比国民党的那些从国内外军事学校出来的军官派低，但我们打败了他们。

人这种动物有一种毛病，就是看不起人，有了点成就的人，看不起还没有成就的人；大国、富国看不起小国、穷国，西方国家是历来看不起俄国人的；中国现在还处于被看不起的地位。人家看不起我们，也是有理由的，因为我们还不行，这么大的国家，只有这么一点钢，有这么多的文盲，人家看不起我们，对我们有好处，逼着我们努力，逼着我们进步。

三、关于依靠群众的问题

列宁的这句话：“社会主义生气勃勃的创造性，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讲得好。我们的群众路线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合乎列宁主义呢？教科书引了这句话以后说：“广大

劳动群众日益直接地积极地参加生产的管理，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参加国家社会主义生产的一切部门的领导”。(p332)也讲得好。但是，讲是讲，做是做，做起来并不容易。

苏共中央一九二八年的一个决议中说：“只有党和广大工农群众最大限度的动员起来了，才能解决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p377)这句话也讲得很好。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做的。斯大林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别的指望，只有靠群众，所以他们要求党和广大工农群众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后来有了点东西了，就不那么依靠群众了。

列宁说：“真正民主意义上的集中制，是要使各地方的创造性、主动精神的各种各样达到总目标的道路，方式和办法都能充分地顺利地发展。”(p454)说得好。群众能够创造出道路来，俄国的苏维埃是群众创造的，我们的人民公社也是群众创造的。

四、关于苏联和我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比较

教科书(p422)上引用列宁的话：“国家如果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等等。这些话讲得很好。列宁是个干实事的人，他在十月革命以后，因为看到无产阶级管理经济没有经验，曾经企图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来训练无产阶级管理经济的能力。那时候的俄国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力量估计错误，不接受列宁的条件，进行怠工破坏，逼着工人不得不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所以国家资本主义没有能发展。

在内战时期，俄国的困难确实很大，农业破坏了，商业

联系被打断了，交通运输业不灵了，搞不到原料，不少工厂没收了，也不能开工。因为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对农民实行余粮征集制。这在实际上是无代价的取得农民劳动生产产品的办法，实行这样的办法，势必对农民翻箱倒柜，这个办法实在不妥，在内战结束以后，才用粮食税制代替余粮征集制。

我们的内战时期比他们长很多，二十二年間我們在根据地中历来实行收公粮和购买余粮的办法，我们对农民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在战争中紧紧地依靠了农民。

我们搞了二十二年的根据地政策工作，积累了根据地管理经济的经验，培养了管理经济的干部，同农民建立了联盟，所以在全国解放以后，很快地进行了和完成了经济恢复工作，接着我们就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主要力量放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同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间，我们是联合农民来对付资本家，而列宁曾经在一个时期说过宁愿同资本家打交道，想把资本主义变成国家资本主义，来对付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这种不同的政策，是由不同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苏联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因为需要富农的粮食，所以对富农采取限制的政策，有点象我们解放初期对待民族资本家的政策。只有等到集体农庄、国营农场一共生产了四亿普特的粮食的时候，才对富农下手，提出消灭富农，实现全盘集体化的口号①。而我们呢？却在土地改革中，就把富农经济实际上搞掉了。

苏联的合作化“在一开始农业曾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P403）这一点使东欧许多国家在实行合作化的问题上增加了许多顾虑，不敢大搞，搞起来也很慢。我们的合作化没

有减产，反而大大增产，开始许多人信，现在相信的人慢慢地多起来了。

五、关于总路线形成和巩固的过程

这两年我们做了个大试验。

全国解放初期，我们全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只能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一九五五年基本上完成了三个改造的时候，在年底和一九五六年春，找了三十几个干部谈话，结果提出了“十大关系”，提出了多快好省。当时看了斯大林一九四九年选举演说：沙皇时代的俄国原生产钢四百多万吨，到了一九四〇年发达到生产钢一千八百万吨。如果以一九二一年算起，二十年只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当时就想，都是社会主义。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多一点，快一点，后来提出两种方法的问题，同时还搞了一个四十条农业发展纲要。此外，当时还没有提出其他的具体措施。

一九五六年的跃进，出来了一个冒进，资产阶级右派抓住这条辫子，举行猖狂进攻，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一九五八年六月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总理作报告，给资产阶级右派一个回击。同年九月党的三中全会恢复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大跃进等口号。十一月在莫斯科修改了《人民日报》上多快好省的社论。这样，冬季全国开展了大规模水利建设的群众运动。

一九五八年先后在南宁、成都开会，把问题扯开了，批判反冒进，确定了以后不准再反冒进。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如无南宁会议，就搞不出总路线。五月少奇同志代表

中央向八届二次代表大会作报告，会议正式通过了总路线，但是总路线还不巩固。接着搞具体措施，主要是在北戴河提出了钢产量翻一翻，大搞钢铁的群众运动，即西方报纸所说的后壳钢铁。同时展开人民公社化，又接着金门打炮。这些事情，惹犯了一些人，得罪了一些人。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毛病，吃饭不要钱、把粮食和付食品吃得紧张起来，刮共产风，百分之十二的日用品供应不上。一九五九年钢产量北戴河定了三千万吨，武昌会议降为二千万吨，上海会议又降为一千六百五十万吨，一九五九年六月间又降为一千三百万吨。所有这一切，被那些不同意我们的人抓住，但是他们在中央反“左”的时候，不提意见，两次郑州会议不提，武昌、北京、上海会议不提，等到“左”倾已经反掉了，指标已经落实了，在反“左”必须反右，庐山会议需要反右的时候，出来反“左”了。

这些说明天下并不太平，总路线确不巩固。经过两次曲折，经过庐山会议，总路线现在比较巩固，如果再来一次曲折，总路线将更加巩固。据浙江省委的材料，有些公社最近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共产风也还可能再次出现。

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那次曲折，国际上出现波匈事件，全世界反苏。一九五九年这次曲折，是全世界反华。

一九五七年和庐山会议的两次整风反右，把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和资产阶级残余势力批判得比较彻底，使群众在它的威胁下面解放出来，同时破除了各种迷信，包括为谓“马钢宪法”②之类的迷信。

搞社会主义革命，过去也是不知道怎么搞法，以为合作化了，公私合营以后就解决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獗进攻，

使我们提出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庐山会议实际上也进行了这个革命，而且是很尖锐的革命，如果不在这次会议把右倾机会主义那条路线打下去，是不行的。

六、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及其他

我们应当把帝国主义之间的相互斗争，看作是一件大事。列宁是把它看成一件大事的，斯大林也是这样看的。他们所说的革命的间接后备军就是指这个。中国搞革命根据地也吃过这碗饭，我们过去存在着地主、买办阶级各派的矛盾，这个矛盾的背后，是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因为，它们内部有这样的矛盾，只要我们善于利用这种矛盾，那么直接同我们作战的在一个时期中就只有一部分敌人，而不是全部敌人，而且我们常常赢得休整的时间。

十月革命胜利后，并能巩固下来，一条重要原因是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多，当时有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出兵干涉，但每个国家派的兵都不多，而且不齐心，相互勾心斗角。朝鲜战争中，美国和他的同盟国也不齐心，战争也打不了，不但美国下不了决心，而且英国不愿意，法国也不愿意。

国际资产阶级现在非常不安宁，任何风吹草动，它们都害怕，警惕性很高，但是章法很乱。

第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危机同马克思的时候不同了，变化了，过去大体上是七、八年或十来年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一九五九年的十四年中已经来了三次。

现在的国际局势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局势紧张得多了，当时资本主义还有一个相对稳定时期，除苏联以外，

其他国家的革命都失败了。英国和法国很神气，各国资产阶级对苏联也不那么怕，除了德国的殖民地被剥夺之外，整个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还没有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三个战败了的帝国主义国家垮台了，英法也削弱了，衰落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十几个国家成功，殖民体系瓦解了，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再也不能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相对稳定。

七、中国的工业革命为什么能最迅速？

西方资产阶级舆论中，现在也有人承认“中国是工业革命最迅速的国家之一”（美国的康伦公司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报告中就说到这一点）

在世界上已经有了许多国家进行过工业革命，比起以往所有的国家的工业革命，中国看来将是最快的一个。

为什么我国的工业革命能够最迅速呢？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比较彻底。

我们彻底地进行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尽力肃清资产阶级的一切影响，破除迷信，力求使人民群众在各方面得到彻底的解放。

注 释

①斯大林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的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中说：“富农在一九二七年生产了六亿多普特的粮食，其中通过农村外的交换卖出了大约一亿三千万普特，这是一个十分严重而不可忽视的力量，当时我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才生产了多少呢？大约八千万普特，其中的（商品）粮食约为三千五百万普特。”所以斯大林断定，在这种情况下，向富农进行坚决进攻是不可能的。斯大林接着说：“现在我们有了充分的物质基础来打击富农。因为一九二九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的粮食不下四亿普特，其中的（商品）粮食在一亿三千万普特以上。”（见斯大林全集十二卷一四二页）

②“马钢宪法”指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炼钢方法。

对供給制的意見

搞供給制，共产主义生活是馬克思主义作风，与資产階級作风对立。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

为什么建設共产主义就不行呢？为什么要搞工資制？这是向資产階級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来貶低我們，結果发展了个人主义。讲說服不要压服也忘掉了，是不是由部队代头恢复供給制？

要破除資产階級法权思想。例如，爭地位，爭級別、要加班費、智力劳动者工資高，体力劳动者工資少等等，都是資产階級思想的残余。各取所值是法律規定的，也是資产階級的东西。将来坐汽車要不要分等級？不一定要有專車。对老年人、体弱者可以照顾一下，其余就不分等級了。

我們的党是連續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給制，从几万人增加到几百万人，一直到解放。初期大体过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要靠革命精神的鼓舞。

中央批轉《鞍山市委关于 工业战綫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語

（一九六〇年三月）

鞍鋼是全国第一个大的企业，职工十多万。过去他們认为这个企业是現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謂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結合”的方針，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許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領導下的厂长負責制。他們认为“馬鋼宪法”（苏联一个大鋼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九五八年以前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一九五九年为第二阶段，人們开始想問題，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馬鋼宪法”。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會議时期，中央收到他們的一个好报告，主张大跃进，主张大右傾，鼓干劲，并且提出一个可以实行的高指标。中央看了这个报告极为高兴，曾經将此报告轉发各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电话发各省、市、区帮助当时批判右傾机会主义的斗争。現在（一九六〇年三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馬鋼宪法的那一套，而且創造了一个“鞍鋼宪法”。“鞍鋼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現了。这是第三阶段。

关于反华問題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二日)

附件請同志們一看，这是我国在巴基斯坦開設展覽会的
一件材料。所謂大反华，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人呢？
不过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动
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
正主义分子，以上三类人，估計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
如說百分之五吧，最多不过占有百分之十。假如說，一百个
人中有十个人反对我們，全世界二十七亿人中，不过只有两
亿七千万人反对我們，而有二十四亿三千万人是拥护我們的，
或者是不反华的，或者是暂时被敌人欺騙對我們表示怀疑的。
这后一种情况，如同一九四九年以前在中国发生的情形一样，
国民党制造謠言，說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多数人
不相信，一部分人表示怀疑。曾几何时，真相大白，共产党
被人們认为最有紀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适合人民愿望的
路綫和政策，而国民党則是一个最坏的党。在我們六亿五
千万人中真正反共的，最多不过百分之十，即是說不过六
千五百万人而已，而五亿八千五百万人則都是拥护我們的，
或者是暂时怀疑我們的。巴基斯坦的情况，就是这样一种情
况，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真正反华的人不过是一小撮人。
在新德里展覽的各国农业館，在所謂大反华空气中展出，到

中国館参观的人民群众达三百五十万人之多，超过任何国家的
农业館。我劝同志們，对于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
国家的反动分子半反动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
主义分子半修正主义分子，对于所有这三类分子要有分析。
第一，他們人数极少。第二，他們反华损伤不了我們一根毫
毛。第三，他們反华可以激发我們全党全民团結起来，树立
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經濟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
国家。第四，他們势必搬起石头打到他們自己的脚上，即是說，
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善良人民面前，暴露了他們自己的丑恶的
面目。所以他們反华，对于我們說来，是好事，不是坏事，证明
了我們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证明了我們的工作做得还
不錯。对于他們說来，是坏事，不是好事，是他們的不祥之兆。
蔣介石一反共，他就倒霉了，一九四六年全面大进攻，只有
三年半，他就被人民打垮了。这件事是人人都明白的。現在
的外国人反华，不过是用口罵我們几句，並沒有动手打人。假
如他們要动手打我們的話，也一定逃不脫蔣介石、希特勒、东
条英机的局面。請同志想一想，假如上述占百分之十左右的坏
人或半坏人，他們不是反华，而是拥华亲华，称赞我們，給我們
說好話，那將置我們于何地呢？我們豈不成了背叛馬列主义、
背叛人民的修正主义者嗎？还有一层，各国坏人半坏人反华，
不是每天都反，而是有間歇性的，有題目可借，例如西藏問題
和中印边界問題，他們就反一陣。这个題目也不可能永远借来
反华，因為他們亏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不相信他們的話，
每天反下去，他們越来越站不往脚。美国和我們的仇恨結得
大一点，但也不是天天大反其华，也有間歇性。其原因也是因
为无理地天天大

反，听众感觉讨厌，市場縮小，只好收場。过一个时期另有新題可借，再来煽动反华。不但現在有較小的間歇性，而且将来会有較大的間歇性，看我們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例如說，我們全党全民真正团結一致，我們的主要生产项目的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接近或超过他們了，这种較大的間歇性就会到来，即是說这会迫使美国人同我們建交，并且平等地做生意，否則他們就会被孤立。我們有苏联的先例可資借鉴。在过去几十年中，凡是反苏的都沒有好結果。反得最凶的是武装进攻苏联，这主要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希特勒的猖狂进攻，其失敗也最慘。因此，我劝同志们利用巴基斯坦这件材料，想一想我們的任务，想一想我們的工作，想通这个所謂大反华的問題的性质和意义，作出充分的精神准备，准备着世界上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长期地但是間歇性地反对我們。所謂长期，至少要打算十年，甚至会有整整二十世紀的后四十年。如果給我們四十年時間的話，那时候世界情形将起大变化，那百分之十的坏人或半坏人的多数或大多数很有可能被他們自己的人民所推翻，而我国則很有可能平均每人有一吨鋼，平均每人有二千斤至三千斤粮食和飼料，多数人民有大学的文化程度，那时人們的政治觉悟水平和理論水平将提到比現在高得多，整个社会很有可能在那时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总之，一切問題的中心在于我們自己的团結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

十年总结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八日)

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勢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民头脑的真实反映，即人們对于客观外界的辯证法的認識过程。中間經過許多錯誤的認識，逐步改正这些錯誤，以归于正确。

錯誤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說，不犯錯誤的人从来沒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視犯錯誤，找出犯錯誤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錯誤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綫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錯誤也是难于避免的，那里有完全不犯錯誤，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謂圣人呢？真理的認識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們是辯证唯物論的認識論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認識論者。自由是必然的認識，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認識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我們已經有了十年的經驗了，已經懂得了不少东西了。但是我們对于社会主义建設，經驗还不足，在我們面前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国，我們还不能深刻地認識它。我們要在今后实践中繼續調查它，研究它，从中找出它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这些規律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中央批轉山西省委 关于农村劳动力問題的报告

(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

山西省委关于农村劳动力問題的报告很好，現在发給你們研究。

农村劳动力問題是目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大問題，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經济持續跃进的一大問題，必須引起全党同志的重視。山西省委的报告讲得很对，如果不立即改变目前农业生产战线劳动力既少又弱的状况，那么，所謂国民經济以农业为基础，所謂粮食是基础的基础，都将变成空談。人是每天要吃飯的，不論办工业、办交通、办教育、搞基本建設，办任何一項事业，都离不开粮食。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当忘記这个最简单的、千真万确的道理。三个月来，山西省委认真地采取了措施，已經从各个方面压缩一百一十万劳动力回到农业生产战线，农村劳动力情况有很大好轉。中央要求各級党委和各部門的領導机关，认真地研究山西的报告，参考山西的經驗，从各方面研究，严格遵守党中央历次頒布的关于节约劳动力的各項指令，根据你們的实际情况，采取

一切有效的措施，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綫，迅速改变当前缺乏劳动力的严重状况。

中 央

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对聶荣臻副总理 关于技术革命的报告的批示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我国工业交通战线、农林牧付漁战线、財政貿易战线、文教卫生战线和国防战线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全民运动，正在猛烈开展，新人新事层出不穷，务請你們精心观察，随时总结，予以推广。

向高干推荐的經典著作

馬克思

1、共产党宣言；2、僱佣劳动与資本；3、政治經濟学批判、导言、序言；4、1848—1850法兰西階級斗争；5、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6、致庫格曼；7、工資价格和利潤；8、法兰西内战；9、哥达綱領批判。

恩格斯

1、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2、自然辯证法导言；3、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4、反杜林論（暴力論部分）；5、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

列宁

1、哲学筆記；2、怎么办？3、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4、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5、帝国主义論；6、国家与革命；7、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8、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9、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

斯大林

1、列宁主义問題；2、論反对派（文集）；3、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4、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5、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

普列汉諾夫

1、論一元論历史观的发展；2、論文艺。

教育青年的原則

教育青年的原則是：

一、教育他們掌握馬列主义，克服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

二、教育他們有紀律性，組織性，反对組織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

三、教育他們决心深入下层实际工作，反对輕視实际經驗。

四、教育他們接近工农，决心为他們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識。

《反对本本主义》序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一日）

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紅軍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沒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們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時間大約在一九三〇年春季，已經三十年不見了。一九六一年一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館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館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来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們参考。

在八屆九中全会上的講話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

讲一下工作會議上讲过的調查研究。在民主革命时期犯过几次路綫錯誤，右的不做調查研究，左的也不做。那时中国是什么情况？应用什么路綫策略問題，沒有解决。大革命和第二次革命战争也遭到失败后，經過遵义會議，“七大”整风，到四九年取得革命胜利。

解放战争时，同蒋介石作战情况比較清楚，革命那一套比較熟悉，情况比較单纯些。

胜利以后，几亿人民生活，情况比較复杂。过去几次錯誤，有了比較容易教育全党。几年来誰也做調查研究，但較少。对情况不甚了解，如地主复辟問題，不是我們有意挂他們一笔帳，是事实如此。他們挂共产党旗帜，行的是复辟之实。在出了乱子后，我們才認識到，凡是三类社队大体上和反革命有关。死官僚是民主革命同盟軍，还有一部分人是糊涂人，不懂三級所有制，不懂共产风刮不得，反革命利用他們，把坏事做尽。

河南省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用粮，“四高”，現在不搞“四高”了，而是低标准、瓜菜代，事物走向反面，这就比較合乎实际了。

农轻重、工农业并举、两条腿走路讲了五年，去年沒有

实行，看来今年可能实行，只能說可能，还未实现，計劃中已經反映了这一点。

对地主复辟，也缺乏調查研究。对城市反革命分子比較注意，匈牙利事件后，我們讓他們分散地大鳴大放，出現了几万个小匈牙利，北大、人大、清华都出来小匈牙利，整出四十多万个右派。农村也整了，不彻底，但是沒有料到地主复辟的問題，抽象的讲是料到的，过去总是讲资产階級和无产階級的矛盾，“八大”決議上說是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

庐山會議反右，把糾“左”打乱了，当时反右是非反不可，共产风又大刮起来，搞了几个“大办”，当然大办水利、大办工业有很大成績，不能抹煞。

共产风，死官僚，糊涂人，革命队伍地主复辟問題，有些过去讲的不清楚，有的讲了也不灵。

庐山会前，糾“左”問題还未搞清楚，彭德怀强迫我們应战，打乱了反“左”。

去年中央主要領導同志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国际問題上。

一月上海，二月广州，三月杭州，五月上海，九月北戴河以及莫斯科會議，中央顾那一头，也影响了地方同志。

赫魯晓夫完全忙于召开布加勒斯特會議，七月苏共全会做出攻击我們，为什么？因为他不这样不好办，在国内站不稳，他們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他們怕三篇文章象怕瘟疫一样，我們不怕“三无”。修正主义几部书，我們要翻印几十万部，我們不怕他們那一套，不研究不行，他們說我們鬧宗派活动，說中国鬧宗派，对苏鬧綱領就是三篇文章。

对三篇文章，不仅我們說好，許多外国人也說好。

他为什么忙开布加勒斯特会议？因为他想稳住阵脚，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会把我们压下去。

对国内问题也应聚精会神地加以研究，工人阶级要团结农民大多数，首先要依靠贫农、下中农、表现好的中农。

莫斯科会议基本上把反华风潮打下去了，反华来自美国、印度、南斯拉夫、兄弟党中的右倾机会主义。

同意刘晓同志意见，问题还未解决，因为他们有社会基础。

我们党内也有代表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

不要损害富裕中农利益，不能剥夺农民的，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只是一退赔，群众就满意，情绪就改变。

今年不搞两本帐，不要加码，一切从实际出发。粮食过称入仓，不要“四高”，低一点，坚决实行一本帐，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坚决整掉“五风”。

城市整风搞试点，城市有城市特点，和农村不同。

今年计划看来比去年高不了多少，有人建议钢今年不动，还是一千八百五十万吨，就是一千九百万吨，也多不了多少。这个提法是有道理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早已完成，数量上不跃，质量上跃一下。钢不增加，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会说我们大跃进垮了，让他们说些坏话也好，实际上我们要搞质量、技术、规格、管理、生产率……品种降低成本，成龙配套，填平补齐，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其实就是走郎猪育肥。

英国钢产量暂时比我们多，我看再有七年总会赶上甚至超过。是不是能赶上西德（三千四百万吨）？还要再看看。搞经济建设，我们缺乏经验，（和斯谈过）规律的認識是要

几次反复，我们希望不要象搞民主革命那样花二十八年才成功，其实二十八年也不算很长，许多兄弟党和我们建立时间差不多，还未成功。搞建设用二十年取得经验，缩短八年，过去想缩短很多，不行。凡是沒有被認識的东西，就沒有办法改造它。最后还是要鼓足干劲，不要在三月开会时，再反右倾，大家实实在在地革命。还是要坚持总路线，力争上游。有人说现在只讲好省，不要多快，搞粮食就要多快，搞工业，品种、规格、质量也是要多快。

团结问题，中央委员会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核心。庐山会议少数同志闹不团结，我们希望同他们团结起来，不管多少错误还要和他们团结。他们说你也犯了错误，我说很好，错误人人皆有，这是相同的，但长短、大小、轻重不同，性质不同，数量、质量也不同，不要犯了错误就抬不起头来，有些同志工作职务降低了，降低了好。

彭德怀给我来信报告一年学习情况，不管进步不进步，值得欢迎的。

此外在中央和地方工作的同志也有犯了错误的，欢迎他们的工作中改正。山东、河南、甘肃三省情况严重，他们很不了解情况，因此决心不大，方法不大对，现在情况阴了，就好办了。大家关心的信阳（在河南）现在变成好地方，革命地方，面貌一新，夺取政权。甘肃也好转了。其它各地大约百分之二十左右烂掉了。这不光由于粮食问题，据林总报告，军队一万个单位烂掉四百个，百分之四，这不是粮食问题，而是领导权落到敌人手中了。这种情况在城市、工厂、学校也一定有。

对敌人，按我们的政策要清洗出去，死官僚也要改造成

活官僚，长久活不了也要清洗。

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其中也有糊涂人，我們也糊涂过，不然为什么要长征？就是由于不了解情况，政策不恰当。

現在搞社革，社建是新問題，要开訓練班，把县、社、队干部訓練一遍，使他們懂得政策。

不能說干部大多数不可靠，是国民党，一切可以团結的人都要把他們团結起来，但是反革命分子也不能多杀，杀人要謹慎，且不可犯从前犯过的錯誤，过去苏联就杀人多了些，延安訂了干部一个不杀，潘汉年不可杀，一杀就要比，人就多了，我們要实行佛教不开杀戒一条，有些不杀不平民憤的是要杀几个。中委犯了錯誤就不牽連杀不杀的問題。我們不犯斯大林錯誤，也不会犯赫魯晓夫的錯誤，他文明些，只是开除中央委员会。

要同苏联团結，同兄弟党团結，同八十七国党团結，不管他們罵过我們什么。不要地挨罵，共产党有史以来就是挨罵的，不挨罵就不是共产党。不管他們怎么样，我們要采取团結的方針。必要时，如在会上，對他們违反原則的东西，不管什么人都要提出批評。他們罵了我們五条：紙老虎，东风压倒西风，尼赫魯反华時間越多越好，馬列主义中国化。

馬列主义根本一样，枝叶不同，如都是树，枝叶不同，各国情况不同，我們过去就吃了这个亏，只注意普遍真理，不注意調查研究，希望今年成为調查研究年，大兴調查研究之风。讲了这些无人反对，但是贊成的也不多，贊成的也没有兌現。在实践上調查研究，專門調查研究也可以，贊成就实行，不贊成也无法。

× × ×

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誰是好人、坏人，群众是摸底的。有的是地主分子、坏人掌握了领导，有的是变质了的干部，被拉过去，……群众摸底，就是我們不大摸底。要有决心，要派大批干部去，深入扎根串联，深入发动群众，否則是不能解决問題的。

我們下去检查工作，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不是用別人的眼睛），要亲耳去听、用手去摸、用口去讲、开調查会，……这几年不調查了，只凭估計办事，劝同志們要大興調查之风，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沒有把握就不要发言，不要下决心。搞調查并不那么困难，不要那么多的人、時間，农村里調查一个社队，城市里調查一、二个工厂、商店、学校，合起来不过十几个。也不要都亲自去搞，自己搞一、二个，其他的，組織一个班子，亲自去领导，……这件事极为重要，党委书记、委員都要搞調查研究，否則情况就不清楚。……要了解好、中、坏的典型。

做工作要要求三点：情况明、决心大、方向对。情况明是第一条，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談起。

有了正确方針政策，如情况不明也不行。郑州會議的方針是对的，只是說不算帳，不退賠，后来改过来了。上海會議，規定了十八条，批麻城报告，也說要退賠。一九五九年我批了二、三万字的东西，可見打笔墨官司还不行，因情况被封锁，認識有距离，現在省委、地委同志認識比較深刻了。

一九六一年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我們是有实事求是的傳統的，大概是官做大了，就不注意去摸情况了。不摸典型，工作就不好做，今后大家都去作調查研究，不要尽讲人

家的坏話。

我們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期，提倡調查研究，在全党內調查研究作风比較好。解放十多年来，这作风比較差。什么原因？要进行分析。因为民主革命时期，犯了几次路綫錯誤……左的、右的，都不搞調查研究，当时中国是什么情况，应用什么战略、策略、方針，长期未解决，……解放战争时期，同蒋介石作战，比較注意搞調查，情况比較清楚。搞革命那一套我們比較熟悉，問題也比較单纯。解放后情况比較复杂。过去有几次錯誤，容易教育全党。解放后，几年来，做了一些調查研究，但不够，对情况不甚了解，如农村中地主階級复辟問題，……是出了乱子，我們才認識到地主階級复辟。凡是三类县、社、队，大体上都与反革命有关。死官僚主义分子，是不顾党的政策和群众死活的，是属坏分子中的第三类。第二类是蜕化变质的，第一类是地主分子。对一、二类是敌我矛盾，……与死官僚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但必須严肃处理，撤銷领导崗位，进行教育改造，凡愿改正的在工作中改正。还有一类是心中沒有数，糊里糊涂，是第四类。政策水平一般，有些問題不那么清楚，是第五类。头脑清楚，心中有数，做得比較好，是第六类。……就全国說，百分之九十以上干部是好的，比較好的。社、队百分之八十是好的或比較好的。死官僚在主观上不一定帮助反革命，但实际上帮助，一部分与他們是直接同盟者。凡三类社都与反革命有关。死官僚不顾人民死活，不管主观上如何，实际上是反革命的同盟軍。有些人不知道三級所有，共产风刮不得。反革命就利用死官僚和糊涂人做尽了坏事。

我們对地主階級复辟缺乏調查研究，对城市反革命比較

有底。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后，大鳴大放，底摸清了，搞出几十万右派，农村也搞了一下整社，但未料到地主階級复辟。抽象地說也料到，因为說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天下，还是无产阶级的天下？但未調查研究，情况不明，决心不大。一九五九年刮共产风，因情况不明，所以决心不大。中間加上庐山會議，出現了右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不得不被迫与右傾机会主义作斗争，这不得不反。但之后，共产风又刮起来，急于过渡，搞了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工业，大办农业，大办社有經濟，大办土铁路，取得很大成績，不容抹杀，但怎么能那么大办？……庐山會議后，情况不大清楚，就从右边刮了一陣风，它与国际上修正主义、国内右派相呼应。去年中央同志集中力量对付国际問題，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我們对国内問題也要聚精会神，反对反革命分子，死官僚分子，組織貧下中农的委员会代替它，团结农民（貧下中农）。在我們党内有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分子，要纯洁組織。

党内团结問題。中央委员会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核心。庐山會議上，有少数人鬧不团结，我們要讲团结。有进步好，是否真的有进步？他們說：“你也有錯誤。”这句话說得好。人人有錯誤，但大小、长短、性质有所不同。犯个錯誤，不要抬不起头来，中央、地方，都有犯錯誤的。

今年着重搞好质量、品种。××吨鋼，这个数字不算少，問題是质量不够，所以不着重发展吨数，而着重品种、质量、规格。

工业已摸了一些底，还要繼續摸。要縮短工业、重工业，特别是基本建設的战綫，要延长农、輕工业的战綫，今

年不搞新的基建，有的过去搞的继续搞，有的今年也不搞了，就让它摆着。……现在看，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要讲波浪式前进。伯达同志提出，搞社会主义是否也有周期律？同行军一样要有大休息、小休息，两次战役之间要休整，要劳逸结合。

农、轻、重，工农业并举，两条腿走路，讲了五年了，没有实现。现在可能实行了，我只讲可能，因为一九六一年计划反映了农、轻、重关系，有实现的可能。

这次会议上，情况逐步明了，决心逐步大了，但还是参差不齐。有的同志说，刮共产风要破产还债。听起来这句话不好听，实际上就是要破产还债。县、社两级统统破产就好了，破了产后，再真正白手起家。过去是黑手起家。我们是马列主义者，不能剥夺劳动者，我们只能剥夺剥削者，这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黑手起家就是剥夺来的，是违反马列主义的。地主、资产阶级是剥削劳动人民的，他们的方法是逐步使劳动人民破产。我们是一下子平调，用这种办法，建立社有、公有经济。国营经济不等价、低价收购，就会剥削了农民，这会使无产阶级脱离了同盟者——农民。话好讲，实现起来就没有那么容易。第一书记是否都有决心破产还债？一个省也是参差不齐的，领导人差的就是决心不大。

郑州会议（一九五九年三月）后，赔、退彻底的，不再刮了，但有的还在刮。今年秋季，中央对情况不明，不了解，纠正得还不彻底。去年春天开这样一次会就好了。去年开了几次会，问题反映不那么集中，情况不那么明，决心不那么大，方法也不大对头。

給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

（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同志们：

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文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省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该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初期学生宜少，逐渐增多，至江西这样有五万人之多。再则党、政、民（工、青、妇）机关也要办学校，半工半学，不过同江西这样的半工半学不同。江西的工，是农业、林业、牧业这一类的工，学是农、林、牧这一类的学。而党、政、民机关的工，则是党、政、民机关的工，学是文化科学、时事、马列主义理论这样一些学。所以两者是不同的。中央机关已办的两个学校，一个是中央警卫团办的，办了六、七年了，战士、干部们从初识文字进小学，然后进中学，然后进大学。一九六〇年，他们已进入大学部门了。他们很高兴，写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可以印给你们看一看。另一个是去年（一九六〇年）办起的，是中南海党的各种机关办的，同样是半工半读，工是机关的工，无非是机要人员，生活服务人员，招待

人員，医务人員，保卫人員以及其它人員。警卫团是軍隊，他們也是警卫职务，即是站崗守卫，这是他們的工。他們还有严格的軍事訓練。这些与文职机关的學校是不同的。一九六一年八月一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三周年紀念，主持者要我写几个字，这是一件大事，因此为他們写了如上的一些話。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給郭沫若的一封信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毛主席写了《七律·和郭沫若同志》，郭沫若又写了一首和毛主席的詩，毛主席看了，給郭沫若写了此信）

和詩好，不要“千刀当剝唐僧肉”了。对中間派采取了統一战綫的政策，这就好了。

在接見日本朋友时的談話

（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

“日本除了亲美的壟斷資本家和軍国主义軍閥之外，广大人民都是我們的真正朋友。你們也会感到中国人民是你們的真正朋友。朋友有真假，但通过实践可以看清誰是眞朋友，誰是假朋友。

“中国有句古話：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日本的岸信介和池田勇人是美帝国主义和蔣介石集团的好朋友。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是好朋友。

“是美帝国主义迫使我們中日两国人民联合起来的。我們两国人民都遭受美帝国主义的压迫，我們有着共同的遭遇，就团結起来了。我們要扩大团結的范围，把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全世界除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以外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团結在一起。

“尽管斗争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日本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革命經過无数次的曲折：胜利、失敗、再胜利、再失敗，最后的胜利属于人民。日本人民是有希望的。”

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續編）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第二方面，我劝另外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摇摆的，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面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就是动摇的，在历史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的。历史上四条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国民党说我们是秧歌王朝）。他们爱心如谈，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表大会讲过，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动摇，不戴高帽子，讲成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谨慎惨惨戚戚的泄气性、悲观性。我们不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与右派不同，他们也搞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沒有经验，一有风吹草动就站不住脚，就反冒进。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就站住脚了，如恩来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也会站住脚的。恰恰是那时批评恩来他们那一部分人，这次取他们的地位而代之。不讲冒了，还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

说“有失有得”，“得”放在后面，是经过斟酌的了。如果戴高帽子，这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因为右的性质，往往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下，右起来了。

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都登出来，一年登到头，登得完登不完？还有文章长短，我看至少要一年，这样结果如何？我们的国家就垮台了，那时候帝国主义不来，国内人民也会起来把我们统统打倒，你办那个报纸天天登坏事，无心工作，不要说一年，就是一个星期，那也要灭亡的。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就不是无产阶级了，这就是资产阶级国家、资产阶级的党了，章伯钧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没有人这样主张，我是用夸大说法。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走，我就找红军，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性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部分不妥。

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不加引号的左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一些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个论调。现在这种同

志的論調右派不欢迎才怪，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帜，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究对这些同志有益还是有害？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我不是说要讲吗？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让人家讲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二十天了，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周恩来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啊？有此权力！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我看全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不要怕，河南等省有百分之九十的食堂还在，那也可以试试看，不要搞掉，我是就全国来讲的。不是讲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句话？我是个粗人，很不文明。三分之一农民，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二亿五千万，多几个河南、四川、云南、湖南、上海等等，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河北一九五六年公社化以前就有办的，一九五八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动力。我看还有一条，节省物资。如果没有后面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比如自来水，搞个东西不用挑，这样一来，可以节省劳动力，还可以节省物资。现在散掉一半有好

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和你说法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个中间派，河南、湖北、四川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科学院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登徒子好色赋》的办法。登徒子攻击宋玉三条：漂亮、好色、会说话，不能到后宫去，很危险。宋玉反驳说：“漂亮是父母所生，会说话是先生所教，好色，无此事。天下佳人不如楚，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增一分过长，减一分过短……。”登徒子是大夫，大夫就是今天的部长，是大部，如冶金部长，煤炭部长，还有什么农业部长。科学院的调查组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攻其一点的办法，无非是猪肉、头发卡子。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都有错误，我也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可以多一点，再试试看，试他一年、两年，估计可以办成。人民公社不会垮台？现在没有垮一个，准备垮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就是要办好，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文化教育。

许多事根本料想不到。不是说党不管党吗？现在计划机关不管计划，一个时期不管计划。计划机关，不管是计委，还有其他各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综合平衡，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后开始不管了，名曰计划指示，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要多少铁，就要多少交通。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子运。这点我没料到。我和××、总理根本没有管，不知就可说也。我不是开脱，也

是开脱，因为我不是計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設根本外行，对工业計劃一点不懂，在西楼（註：指北京中南海西楼）时曾經讲过，不要写英明領導，管都沒管，还說什么英明？但是，同志們，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主要責任在我身上，應該說我。过去責任在別人，恩来、××現在應該說我，实在有一大堆事沒管。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大办鋼鐵的發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說是我。我和柯庆施談过一次話，說六百万吨，以后我找大家談話，有×××也覺得可行。我六月讲一千七十万吨，后来去做，北戴河搞到公报上，××建議，也覺得可以，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陣。所謂始作俑者，應該絕子絕孫。搞了个小土群……。看了很多討論，大家讲还可以搞，要提高質量，降低成本，降低硫的成份，出真正好鉄，努力奋斗，只要抓，也有可能。共产党有个办法叫抓。共产党和蔣介石都有两只手，共产党的手是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鋼鐵要抓，粮、棉、油、麻、絲、茶、糖、菜，还有烟、果、油杂，农、林、牧、副、漁中有十二項，要抓，要綜合平衡，各地不同，不能每个县都一个規模。湖北有个九公山，万山云中长竹木，要搞粮食，把竹木不搞了。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蔗，要因地制宜。苏联不是到过回民地区买猪嗎？岂有此理！

工业計劃，搞了一篇文章，写得还好。至于党不管党，計劃机关不管計劃，不搞綜合平衡，搞什么去了？根本不着急，总理着急，他不急。人不着急，沒有一眼神气，沒有一股热情，办不好事情。有些人批評計委李富春同志是“足将进

而趁起，口将言而囁嚅。”但也不要象李達，太急了，也不行。列宁热情磅礴，实在好，群众很欢迎。口将言而囁嚅，无非有各种顾虑。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現在展开了。有話讲出来，記錄为证，口說为凭，以此为证。你們有話就讲出来，你們抓住，就整我嘛！不要怕穿小鞋。武都会議讲过，不要怕坐班房，甚至于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級干部，那么多的顾虑，就是怕讲的不受受整，这叫“明哲保身”啊！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两种人都不高兴我，一种是触不得，一种是方向有点問題。不贊成，你們就駁。說主席不能駁，我看不对。事实紛紛在駁，不过不指名。江西党校、中級党校的那些意見就是在駁。說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一个是一千零七十万吨鋼，一千零七十万吨鋼是我建議的，我下的决心，其結果九千万人上陣，×××人民币，“得不偿失”。其次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發明之权，有建議之权。北戴河會議是我建議写的，当时隨縣山章程，如获至宝。我在山东，一个記者問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說：“好！”他就登了一报。小資产階級狂热性也有一点，以后新聞記者要离开。

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一千零七十万吨，大煉鋼鐵，你們贊成，也可以給我分担一点，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責任在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綫，是虛的，是实的，你們分一点，見之于行动是工业、农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別人也要分担一点。譚老板，你那大炮也相当多，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慎重，共产共的快。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传的快，說話不謹慎，把握不大，要謹慎一点。长处是一股干劲，肯負責任，比那

些悽悽慘慘戚戚要好。但放大炮，在重大問題上需要謹慎。我也放了三大炮：公社、煉鋼、總路綫。××說他粗中無細，我是張飛粗中有点細。人民公社我說集體所有制，我說從集體所有制到共產主義全民所有制的過程，兩個五年計劃太短了一点，也許要二十個五年計劃！

說要快，馬克思也犯過不少錯誤，天天想着歐洲革命要來了，又沒來，反反復復，一直到死了，還沒有來，到列寧時才來了。那不是性急？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插話：列寧也說過世界革命形勢到來了，以後沒有來。）馬克思開始反對巴黎公社，季諾維也夫反對十月革命，季諾維也夫後來被殺了，馬克思是否也殺呀？巴黎公社起來了，他又贊成，估計會失敗，看到這是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三個月也好。要講經濟核算，這划不來。我們也有廣州公社，大革命失敗了。我們現在的工作是否會象一九二七年那樣失敗？象二萬五千里長征，大部分根據地喪失，蘇區縮小到十分之一？不能這樣講，現在失敗沒有？到會同志都說有所得，沒有完全失敗。是否大部分失敗？不是。是一部分失敗，多付了代價，刮了一陣共產風，全國人民受了教育。

斯大林社會主義經濟學問題，在鄭州談過兩遍，就講學，現在要深入研究，否則事業不能發展，不能鞏固。

如講責任，×××，×××有点責任，農業部×××有責任。第一個責任是我。柯老，你的發明權有沒有責任？（柯老插話：有。）是否比我輕？你那是意識形態問題。我是一個一千零七十萬噸鋼，九千萬人上陣，這個亂子就鬧大了，自己負責。同志們，自己的責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來，有屁放出來，肚子就舒服了。

機關槍和迫擊炮的來歷及其他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昨天上午我說，以“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如何正確地對待革命的群眾運動”為題的那一個文件，“不知是那一位秀才同志辦的，他算是找到了幾挺機關槍，幾門迫擊炮，向着廬山會議的右派朋友們乒乒乓乓地發射了一大堆連珠炮彈。”這個疑問，昨天晚上就弄清楚了，不是廬山的秀才同志，而是北京的劉××和他的兩位助手，發大熱心，起大志願，弄出來的。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鬥爭，看來還得鬥下去，至少還要鬥二十年，可能要鬥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鬥爭才會止息。舊的社會鬥爭止息了，新的社會鬥爭又起來。總之，按着唯物辯證法，矛盾和鬥爭是永遠的，否則不成其為世界。資產階級的政治家說：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的哲學。一點也不錯，不過鬥爭形勢，依時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罷了。我現在說，社會經濟制度變了，舊時代遺留下來的殘存於相當大的一部分人們頭腦里的反動思想，亦即資產階級思想和上層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一下子變不過來，要變需要時間，並且需要很長的時間。這是社會上的階級鬥爭，黨內鬥爭反映了社會上的階級鬥爭。這是毫不足怪

的。沒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議。这个道理过去沒有讲透，很多同志不明白。一旦出了問題，例如一九五三年高饒問題，現在的彭、黄、张、周問題，就有許多人感觉惊奇。这种惊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矛盾是由隱到显的。人們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經驗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特别是有一些党内斗争，例如高、饒、彭、黄这一类斗争，具有复杂和曲折的性质。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錯了？”人們不知道他們的历史变化，不知道他們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不是很自然的嗎？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們讲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再則，处理这类事件不可以用简单的方法，不可以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而把它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而必須采取“团结——批評——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寬”，“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們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們留在省委員会內，中央委員会內，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內。这样是否有危險呢？可能有。只要我們采取正确的政策，可能避免。他們的錯誤，无非是两个可能性：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改过来的条件是充分的。首先，他們有两面性，一面是革命性，另一面是反动性。直到現在，他們与叛徒陈独秀、罗章龙、张国涛、高崗是有区别的，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轉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是不适当的話，可能不轉化为敌我矛盾，而能始終当做人民内部矛盾予以彻底解决，如果我們能够把这种矛盾及时适当的加以解决的話。下面的这些条件是重要的。全党全民的监

督。中央和地方大多数干部的政治水平，比較一九五三年高饒事件时期大为提高了，懂得多了，庐山會議上这场成功的斗争，不就是证据嗎？还有我們对待他們的政策和态度，一定要适合情况的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政策，而我們已經有了这样的态度和政策。改不过来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无非是繼續搗乱，自取灭亡。那也沒有什么不得了，向陈独秀、罗章龙、张国涛、高崗的队伍里增加几个成員，何損于我們伟大的党和我們伟大的民族呢？但是我們相信，一切犯錯誤的同志，除陈、罗、张、高一类极少数人以外，在一定条件下，积以时日，总是可以改变的。这一点，我們必須有坚定的信心。我党三十八年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为了帮助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就要仍然把他們当做同志看待，当做兄弟一样看待，給于热情的帮助，給他們以改正錯誤的时间和繼續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須留有余地，必須有溫暖，必須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

編 后

我們怀着對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崇拜的心情，為了更好地理解、掌握、運用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我們收集、編印了這本毛主席尚未公開發表的講話和文章。由於稿件多次傳抄，以及我們的水平有限，錯誤之處在所難免。因此，希望讀者均勿公開引用或外傳，僅供內部參考。如將來公開發表，則以公開發表者為準。

——編 者